

# 國際問題研究

2022 年第 1 期（总第 207 期） 双月刊 2022 年 1 月 15 日出版

## ■ 特稿

---

- 1 2021 年中国外交：秉持天下胸怀，践行为国为民 王 毅
- 13 大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 罗照辉
- 19 人民外交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王 超
- 23 积极开创新时代民间外交工作新局面 林松添
- 31 关于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 崔天凯

## ■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

- 35 “两个确立”是中国外交再创辉煌的根本保障 阮宗泽
- 52 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内涵、特征与弘扬路径  
邢丽菊 鄢传若斓

## ■ 国际关系

---

- 67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及其局限 严少华
- 85 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张 蓓
- 105 “价值观外交”：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 熊 炜 姜 昊

# Table of Contents

China's Diplomacy in 2021: Embracing a Global Vision and Serving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i>WANG Yi</i>
China's Foreign Ai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LUO Zhaohui</i>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Assist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WANG Chao</i>
Actively Breaking New Ground i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i>LIN Songtian</i>
A Few Thoughts on China-US Relations	<i>CUI Tiankai</i>
The "Two Establishments" are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Further Achievements of China's Diplomacy	<i>RUAN Zongze</i>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s of Promotion	<i>XING Liju &amp; YAN Chuanruolan</i>
The EU-US Policy Coordination toward China: New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i>YAN Shaohua</i>
The Impacts of Brexit on EU-US Relationship	<i>ZHANG Bei</i>
Value-based Diplomacy: The Diplomatic Axis of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	<i>XIONG Wei &amp; JIANG Hao</i>
Abstracts	

# 2021 年中国外交： 秉持天下胸怀，践行为国为民<sup>\*</sup>

□ 王 毅

纵观 2021 年世界形势，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都在探索应对之道，人类需要作出正确抉择。

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重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而另一种则是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致力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共赢，践行平等尊重。两种取向、两大趋势的博弈和较量，必将深刻影响人类和地球的未来。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我们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把握前进方向。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坚持平等相待、反对强权霸凌，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发展的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盘点 2021 年中国外交，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秉持天下胸怀，践行为国为民，在全球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在斗争与合作中勇毅前行。一年来，最坚定的指引是元首外交，最鲜明的旗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突出的题目是讲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最显著的风格是科学应变、积极进取。归结为一条主线：在复杂

---

<sup>\*</sup> 本文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21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发表，有关数据和表述做了一些更新。

博弈中服务民族复兴，在风云激荡中推进和平发展。

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

**第一，面对世纪疫情延宕反复，我们开展卓有成效的抗疫外交，彰显说到做到的大国担当。**全球疫情夺走 540 多万鲜活生命，携手抗疫是国际社会当务之急。中国不仅以国内动态清零打造了防控疫情的样板，而且以加强国际合作树立了团结抗疫的标杆。我们以实际行动，开辟冲破疫情至暗时刻的前行之路。

我们明确全球抗疫的正确方向。从世界卫生大会到全球健康峰会，从联合国讲坛到双边通话会晤，习近平主席在关键时刻倡导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带领中国始终站在国际抗疫合作“第一方阵”，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第一属性”，担当疫苗公平分配“第一梯队”。这同个别国家热衷政治操弄、破坏团结抗疫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们为战胜病毒提供有力武器。中国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已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0 亿剂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在有的国家超量囤积疫苗、大搞“疫苗民族主义”背景下，中国疫苗成为“人民的疫苗”、“世界的疫苗”、“可及的疫苗”，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我们为发展中国家雪中送炭。“疫苗鸿沟”成为当前战胜疫情最大阻碍，低收入国家只有 5% 的人口完全接种疫苗。习近平主席心系发展中国家，响应非盟制定的非洲 60% 接种率目标，宣布中国再向非洲提供 10 亿剂疫苗，包括无偿援助 6 亿剂；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再向东盟国家援助 1.5 亿剂疫苗；明确未来 3 年内提供 30 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发展。我们还支持中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同 20 国合作生产疫苗，让疫苗跨越山海，跑赢病毒。

我们为病毒溯源合作正本清源。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政治病毒

是疫情肆虐的帮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同世卫组织发布联合专家组溯源报告，体现了公开、透明的合作态度。个别国家借病毒溯源之名，行政治攻击之实，不仅破坏了国际抗疫努力，也放纵了病毒的滋生蔓延。全球 80 多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反对溯源政治化，中国 2500 多万网民联署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反对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已成为国际共识。无论是新冠病毒还是政治病毒，最终都将被人类所战胜。

**第二，面对全球发展多重风险，我们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为共同发展提供新机遇。**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复苏是各国共同的任务。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脆弱曲折，通胀、债务、能源、供应链危机相互交织，减贫成果严重侵蚀，南北鸿沟不断拉大，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任重道远。

一年来，我们抓住发展这个总钥匙，致力于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期待就此形成国际合力，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新的动力。这一重大倡议是中方为促进全球发展事业提供的中国方案，已得到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近百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一年来，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2021 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 周年。从博鳌到达沃斯，从服贸会到进博会，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以更短的负面清单、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第四届进博会参展国别、企业数量双提升，127 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0 家企业参展，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全球覆盖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正式启航。我们还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保护主义逆风

中迈出开放合作新步伐，带来全球复苏新利好。

2021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克难前行的一年。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擘画新蓝图，前10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货物贸易额逆势增长23%，中欧班列开行量货运量逆风跑出加速度。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实现了老挝人民多年来“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的梦想。在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共同支持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造福世界的“富裕带”，惠及人民的“幸福路”。

第三，面对真伪多边主义的较量，我们高举真正多边主义的火炬，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秩序稳定。我们隆重纪念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是改变世界的大事件，也是多边主义的再出发。50年来，中国为实现联合国理想不懈努力，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同时我们看到，个别国家打着多边主义旗号，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标榜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把自己的“家规”强加给国际社会；声称“不搞新冷战”，却处处以意识形态划线。对此，习近平主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在国际、地区、双边各层面密集发声，剥去各种伪多边主义的画皮，反映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推动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朝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完善。

针对有的国家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伪命题，我们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阐释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提出人民是否满意才是衡量民主的终极标准。我们在多边讲坛和双边对话中激浊扬清，守护真正的民主精神，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让一切唯我独尊的“民主”、高人一等的“民主”现出原形。在这场真假民主的大讨论中，反对垄断民主定义权、反对以意识形态分裂世界，正在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第四，面对世界格局深刻演变，我们推动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发展，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大国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对世界和平稳定负有特殊责任，更需要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中国积极探索并大力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迈上新高度。中俄隆重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正式宣布条约延期，凸显了双方互为战略依托、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的坚定决心。一年来，中俄元首 4 次会晤通话，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中俄携手抗疫为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打上时代“高光”，各领域互利合作为各自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双方围绕国际和地区热点的战略协调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俄力量”成为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俄关系经受各种考验，焕发勃勃生机，树立了大国战略互信的典范、邻国互利合作的典范、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俄组合”团结如山。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俄世代友好的初心不会改变，合作共赢的目标不会改变，捍卫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

中美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年初以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两次通话，举行首次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战略框架，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把舵引航。双方外交代表在安克雷奇、天津、苏黎世、罗马等多个场合深入沟通，中方点出影响中美关系的症结和要害所在，亮明“三条底线”、打出“两份清单”。强调中国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高人一等的国家，美国应当改掉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的老毛病。要求美方不得挑战中国的道路和制度，不得阻挠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经过不懈努力，被非法拘押一千多天的孟晚舟女士平安回国，有力伸张了公道正义。美方亦表示，愿与中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管控分歧，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一年来的折冲和交锋再次说明，中美关系之所以遭遇严重困难与多重挑战，根本原因在于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作出了战略误判。美方一些人内心不愿承认别的国家也有发展的权利，不愿接受中国不断壮大进步的事实，不愿认同中美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道理，试图拉帮结伙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美方的错误言行不仅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也严重冲击世界和平稳定。对此，中方的态度一贯而且明确：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半个多世纪交往得出的最主要经验教训，今后的历史必将继续证明这一真理。希望美方切实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践行承诺，取信于人，同中方一道探索两个大国的和平共处之道。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挑战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主席两度主持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视频峰会成功召开。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等“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稳步推进，中欧经济利益融合不断加深。中欧在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等领域存在广泛共识，在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抗击疫情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尽管中欧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但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们发展中欧关系的诚意始终不渝，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坚定不移。希望欧方也能继续坚持战略自主，排除干扰因素，与中方一道，共同推动中欧合作行稳致远。

**第五，面对和平发展成为人心所向，我们推动周边国家共建美好家园，共护地区安宁。**亚洲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维护区域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地区各国普遍呼声。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个别域外大国通过所谓“印太战略”挑拨地区对抗，制造阵营对立，正在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因素。中国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与周边国家深化合作，推动双多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

我们聚焦区域合作，夯实友好根基。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

庆祝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宣布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新的跨越。我们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引导“一带一路”建设同东盟印太展望的重点合作领域对接，搭建澜湄立体合作新的架构。李克强总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拓展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合作新的空间。上海合作组织在成立 20 周年之际接收伊朗为正式成员，“中国 + 中亚五国”首次举行外长线下会晤，地区团结不断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日本新首相通话，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为双边关系克服干扰健康发展指明方向。中国与印度保持外交、军事途径对话，有效管控边境地区局部摩擦，共同致力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国与朝鲜、韩国、蒙古等邻国的友好合作也保持良好势头，成为地区稳定的积极因素。

我们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斡旋热点问题。美国及其盟友仓促撤离阿富汗，地区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作为友好近邻和负责任大国，中方主动施加正面、积极影响，推动建立阿富汗问题邻国外长会新机制，发挥邻国优势和独特作用。向阿富汗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开启“松子空中走廊”，协助阿富汗改善民生。引导阿富汗新政权奉行包容、反恐、睦邻政策，坚决打击“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支持阿富汗防乱维稳、制恐止暴，走向良性发展。缅甸是中国的胞波友邻。面对缅甸国内政局变化，中国始终支持缅甸与东盟合作，逐步落实东盟提出的“五点共识”，坚决反对外部不当介入。同时，我们开展斡旋促谈，推动局势趋稳降温，鼓励缅甸各方通过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分歧，重启民主转型进程。

**第六，面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振兴的迫切愿望，我们大力开拓南南合作的广阔空间。**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天然伙伴和可靠同盟军。过去一年，我们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统筹抗击疫情和复苏发展，兼顾雪中送炭和授人以渔，全心全意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理直气壮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正当权益。

中非合作掀起新高潮。我们与非洲各国一道，克服疫情影响，成功举办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习近平主席视频出席论坛并提出“中非友好合作精神”，阐述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四点主张”，宣布对非合作“九项工程”，在中非关系史上树起新的里程碑，充分显示中方支持非洲发展振兴的真诚愿望。一年来，中非贸易、投资逆势上扬，全球发展倡议同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开展对接，设立“中非民间投资促进平台”、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助力非洲加快疫后复苏。我们还与非方共同发起“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共同制定“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拓展了中非合作的内涵。

中拉关系继续稳中有进。习近平主席同拉美多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电话沟通，向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表视频致辞，为中拉关系发展明确方向。本届中拉论坛制定出未来三年合作路线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拉美更加走实，能源电力、交通运输、通信等合作续有进展，中拉贸易连续四年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双方正加快构建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拉关系。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保持领导人密切沟通，实现外长交往全覆盖，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四点主张、落实巴以“两国方案”三点思路，为中东贡献维稳促和的正能量。我们还举行首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达成共建应急物资储备库、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等重要成果，应急物资储备库已在本月初正式启用。

事实证明，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坚定一员，永远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心手相连，团结奋进。

**第七，面对全人类共同挑战，我们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迭冲击，人们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呼声越发强烈。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给出了鲜明的中国方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等重大倡议，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动力。

我们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支持加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作用，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重大疫情救治、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打击虚假信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等“五大能力”建设，在全球卫生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为 global 气候治理展现责任担当，相继出台落实“双碳”目标政策体系，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推动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发表中美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坚定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全球治理的行动派。我们还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继续扩大《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影响，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提出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迈进。

**第八，面对外部干涉挑衅，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外交战线肩负人民嘱托，履行使命担当，坚决顶回各种侵权霸凌行径，展现了中国人的自信、自立、自强，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底气、骨气。

台海局势出现新一轮紧张，症结在于台湾当局企图“倚美谋独”，美国以及个别国家有意“以台制华”，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面临被虚化甚至掏空的危险。正是这些倒行逆施改变了台海现状，损害了台海和平稳定，违背了国际社会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我们发出严正警示，进行有力反制，震慑了“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不久前，我们恢复与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建交国总数增至 181 个，一个中国的共识在国际上更加巩固。台湾是终将回家的游子，而不应是被人利用的棋子，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过去一年里，我们还邀请各国人士赴新疆参访，以事实真相戳穿各种谎言与伪证。我们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巩固香港由乱到治、趋稳

向好的良好态势。我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大三委等多个国际舞台坚决回击假借人权挑动事端的行径，展示中国人权发展成就，揭露个别国家人权劣迹，以正压邪，正本清源，赢得近百国支持。我们成功推动173国联署通过联合国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形成国际社会支持北京冬奥会的强大声势。

**第九，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全力服务国内发展，着力践行外交为民。**服务国内发展建设，是中国外交的应有之义。我们成功举办湖北和西藏两场全球推介会，支持举办服贸会、进博会等一系列国际展会，为各地方扩大对外开放搭建新桥梁，拓展新机遇。我们积极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立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搭建运输紧急抗疫物资的“绿色通道”，实施远端精准防控，维护国内抗疫斗争成果。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外交的价值底色。我们始终将海外同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将外交为民担在肩上。我们在全球推进“春苗行动”，协助海外同胞接种新冠疫苗，已惠及180国数百万人次。外交部12308热线24小时为我海外人员纾难解困，已接听来电超过50万通。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约6万件。我们全力守护海外中国公民生命安全，在全球范围开展风险评估预警服务，协助赴海外企业人员提升安防能力，及时撤离高危地区侨民，妥善处理重大恐袭事件，全力营救被绑架人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们加快推进“互联网+领事服务”，推进云端办照、视频公证、移动支付等便民措施。“中国领事APP”全面上线运行，目前下载量已超过280万。正如中国网民所说，伟大的祖国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

一年来，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在国际风云激荡中砥砺前行，在大国世纪博弈中从容自信，取得一系列来之不易的成果，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定向，在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

一年来，外交战线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建设，编写出版《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为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

本遵循。

2022 年，是中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我们将隆重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外交战线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努力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营造更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全力配合办好北京冬奥会。**冬奥会已经进入“北京时间”，中国有信心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弘扬“团结友爱、公平竞争、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恪守联大冬奥休战决议，反对奥运政治化，把冬奥会办成增进理解和友谊、“一起向未来”的交流盛会，为疫情下的世界带来更多信心与欢乐，注入更多勇气和力量。

**二是主动应对后疫情时期多重挑战。**坚持团结抗疫主旋律，打造防疫有力度、合作有温度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用好疫苗这个最有力武器，弥合“免疫鸿沟”这一当务之急。同时，积极开展药物研发合作，共筑多重抗疫防线，形成严防今后大流行的国际合力。

**三是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全球发展倡议是面向世界开放的公共产品。我们愿同联合国机构和各国密切合作，全面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围绕八大重点领域推进合作落地，唱响发展优先理念，重振全球发展合作，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四是拓展深化全球伙伴关系。**深化中俄肩并肩、背靠背战略合作，坚定做全球稳定的支柱、维护和平的基石、公平正义的担当。加强中欧高层战略沟通，坚持对话合作主导面，把准互利共赢主基调，继续做伙伴而不当对手。加强同周边国家融合发展，全面深化利益交融和民心相通，携手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共同家园。坚定做发展中国家真诚可靠的伙伴，支持各国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

**五是致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健前行。**2022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中美双方应当重拾融冰初心，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共同探寻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处之道，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六是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对于任何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威胁挑战，我们都将坚决斗争；对于任何干涉我国内政、肆意造谣抹黑的恶劣行径，我们都将坚定反击。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平等相待，实现合作共赢。我们历来不依附别人、也从不掠夺别人，同时我们也决不会接受对中国进行任何胁迫和讹诈。

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文明进步潮流浩荡向前，中华民族复兴步伐不可阻挡。新的历史征程上，中国外交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继续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奋力前行，为中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为历史、为未来书写更新篇章。

【责任编辑：李静】

# 大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sup>\*</sup>

□ 罗照辉

2021年，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援外战线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以服务元首外交为遵循，以抗疫国际合作为重点领域，以“小而美”项目为重点方向，既促进受援国抗疫和经济社会恢复，又有力服务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了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1+2+3。

“1”是聚焦一个重点，即引领国际抗疫合作。新冠疫情肆虐已经两年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隧道尽头的光芒”。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部署下，中国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2020年是以抗疫物资和经验交流为主的援助“上半场”。中国先后向150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42亿件防护服、84亿人份检测试剂、3720亿只口罩等大批防疫物资，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医疗专家组。

2021年，中国开启了以疫苗援助为主的“下半场”，迄今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亿剂疫苗，占世界首位。30多国总统、总理出席交接仪式并带头接种。中国及时启动周边“抗疫紧急支持计划”，建立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特别是改变对外援助由政府对政府的例行作法，将疫苗和抗疫物资定向投放到缅甸、老挝、越南、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建立“周边抗疫防疫安全带”，策应“外防输入”。中国是首批对阿富汗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中国援助还引领非洲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2021年11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

---

<sup>\*</sup> 本文根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在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2021年12月20日。

**“2”是推动两件大事。**一是推动“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项目。多年来，中国援外考虑受援国需求，在发展中国家援建了一大批楼堂馆所标志性建筑，有力扩大了中国影响力。现在我们注重引导受援国向“小而美”援外新思路靠拢，注重“授人以渔”，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多开展人力资源开发、文化教育等智援，并梳理“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议和具体合作诉求，更加精准有力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2021年11月19日，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专门讲到菌草援外的故事，指示要将“小而美”项目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20年前，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使菌草技术作为官方援助项目首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落地。作为小而美、惠民生项目，它至今已漂洋过海，惠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

二是适度稳慎安排成套项目。2021年中国聚焦抗疫援外，同时考虑到一些项目已动工在建、受援国确有需要、各国疫情形势不一等情况，适度稳慎安排成套项目。如近期移交了援柬埔寨体育馆项目。在公共卫生、减贫脱困、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领域，中国重点发力，大小项目平衡推进。

**“3”是办好三场纪念活动。**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讲话精神，2021年国际发展合作署接连举办中国援外70周年、菌草援外20周年、南南基金和南南学院成立5周年三场重要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专门为后两场活动发来贺信。上述活动有力扩大了中国援外的国际影响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科学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指出“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彰显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大党担当。对外援助正是践行“坚持胸怀天下”的最佳平台。中国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71年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是探索阶段（1950—1978年），援外起步快，投入大，聚焦政治效应。坦赞铁路、喀喇昆仑公路已成为中国援助的标志性符号。中国以援外支持受援国经济发展，同时助力自身打破西方封锁，扩大朋友圈，

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地位。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是改革阶段（1978—2012年），援外改革力度大，从援建生产性项目，转向建设体育馆、议会大厦等标志性建筑，深化了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深度参与了改革开放进程，有力带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援外事业进入创新阶段。首先，援外定位更加精准。强调对外援助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手段，是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大国担当的重要实践载体。其次，理念持续创新。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亲诚惠容等重要理念，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重大倡议，为新时代中国援外和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根本遵循。再次，机制日臻完善。2018年，党中央决定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大力推进援外体制机制改革。最后，贡献日益扩大。专门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面前，“中国援助”从未缺席。

70年援外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为指导，胸怀天下，持续援外。**

“胸怀天下”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全体人类和合共生的世界，是天下一家的世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胸怀天下”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国际援助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认为，外来帮助对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之间应该也必须互相帮助。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应当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共产国际曾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提供了无私帮助。新中

国成立之初，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中国把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看做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

70年对外援助史中，中国不断推进对外援助的理论创新与发展。1954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4年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强烈共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确定了“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援外指导原则。2014年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正确义利观是对外援助工作的价值导向，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

**二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中国强调坚持政府援助主渠道，平等相待、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强调对外援助与互利合作相结合，注重友好合作、互利共赢，融利于义，以义为先，推动与受援国经济互补与共赢发展；强调发挥自身优势，以基础设施为主，帮助受援国解决经济长远发展的瓶颈；强调“授人以渔”，注重与受援国共享发展经验，不把自身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开展广泛的、以分享中国发展经验为基础的多双边人力开发合作；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为前提，根据实际需要也向未建交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三是始终坚持斗争精神，不排斥与美西方合作，积极服务国家对外战略。**有人说，援外是阳光下最高尚的职业。但伴随从未停歇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纷争，世界大国越来越竞相投入，援外领域成为“不见硝烟的战场”。中国援外事业一直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秉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从抗法援越、抗美援朝起步，赢得了政经影响力、国际道义和民心民意。近两年抗疫援助更是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中国的大国风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照出某些西方大国所谓民主制度的虚伪。在2021年初国际社会亟需疫苗时，中国克服重重困难，率先施援，坚定引领全球抗疫合作。某些西方大国则冷对他国急需，超量囤积，饱受诟病。

70多年来，国际援助理念和实践不断演变。首先是从20世纪40年代“马

歇尔计划”开始，“对外援助”(foreign assistance)主要是提供军援和经援，基于意识形态色彩和高度的政治性战略性；以20世纪6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立为标志，“对外援助”演变为“国际发展援助”(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契合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发达国家开始推动形成统一的援助协调机制和标准规划；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开始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标志，“国际发展合作”(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概念取代“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援助”，强调双向、多元和融合。

中国坚持自身援外理论和实践特色，在反驳美西方遏制打压、攻击抹黑的同时，注意与OECD及美西方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对话交流。一方面加强接触沟通，交流互鉴，不排斥同国际标准接轨和一些通用概念，如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名称就体现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探讨并已经在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人道主义领域，通过南南合作基金与联合国多边机构以及西方国家开展三方合作。在这一过程中，美西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援外合作的有效性，并加以模仿。美国“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计划、欧洲“全球门户”计划就是受到“一带一路”倡议调动，内容也是主打基础设施建设。一些西方学者还承认中国援外模式的优越性。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企图控制他国经济命脉的“马歇尔计划”，其贷款合同并未将意识形态或经济要求作为金融援助的条件，不包括中国政府的“邪恶意图”，反而是中国不干涉内政的一种体现。

**四是坚持援助的南南合作属性，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穷帮穷。**中国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具有三重意义。一是我们发展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二是我们发展了，可以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援助，更多帮助其他国家；三是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坚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宣布成立南南合作基金、成立南南合作学院的原因。当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援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是对南北合作主渠道的完善补充。发达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发展振兴势不可挡，东升西降大势所趋。中国越发展，承担的国际责任越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期待越高，美西方对中国遏制也会同步上升。在这一大背景下，对外援助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愈益突出。

**我们将以元首外交为首要，继续引领抗疫国际合作。**疫情仍在肆虐，抗疫国际合作仍是当务之急。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主席已经宣布了一系列重大援助举措，这都是我们要全力落实的。我们将继续向有急需的国家提供疫苗和防疫物资，开展医疗技术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随着疫情变化，各方恢复经济发展诉求强烈，我们将通过常规援助项目，助力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

**我们将以民生为要旨，推动疫后经济恢复。**我们将“小而美”项目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进一步聚焦贫困、失业、卫生、教育等民生问题，加强治国理政经验分享，不断完善丰富“授渔计划”，形成更多接地气、聚人心的品牌项目，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走上经济恢复、自主发展之路。

**我们将以绿色为重点，助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兼备陆海、横跨东西、联通古今、泽被千秋，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我们将积极发挥援外导向和杠杆作用，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责任，实施气变、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等援助项目，积极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我们将以多边为平台，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维护多边主义尤为重要。我们将加强同国际接轨，以及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坚持政府主导、双边为主传统援外模式，同时向官民并举、双多边结合、多元互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

【责任编辑：李静】

# 人民外交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sup>\*</sup>

□ 王 超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取得了丰硕成果，交出了亮丽答卷。这一年，人民外交在持续深入学习党史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深入总结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外交理论，积极开展了民间对外交往新实践。

人民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创举，它以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为宗旨，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特色。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是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自倡导成立并担任名誉会长的新中国第一个人民外交机构，成立于1949年12月15日，与共和国同龄。它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开创了中国和世界外交的新篇章。长期以来，作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外交为拓展外交空间、增进中外相互了解、提升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制定了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外交方针，创造性地开展“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实践，打破了西方对华外交封锁，争取国际支持，大大拓展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这一时期的人民外交是官方外交的“探路者”。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外交学会积极拓展与西方各国开展民间友好交往，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也为中法、中美的正式建交做了重要铺垫工作。这一时期的人民外交是官方外交的“先行者”。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领域对外交往快速发展，人民外交跨入新的历史时

---

<sup>\*</sup>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在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2021年12月20日。

期。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外交为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为中国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和长远性工作。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外交学会秉承“为国交友”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同世界知名政治家、议会、智库、媒体等的交往，积极开展二轨对话和公共外交，在配合总体外交、增进理解互信、推动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助力作用。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共振，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各种复杂严峻挑战。而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信任中国、亲近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人民外交在对外交往中具有独特优势，是官方外交的有益补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作用。

**首先，灵活多样，与时俱进。**人民外交从无定式，从最初的接待外国前政要来访，不断与时俱进，拓宽领域，丰富形式，在二轨对话、大型论坛、地方交流、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等各个方面呈现出超强的创新活力。疫情之下，长期以来人民外交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受到阻碍，我们便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云人民外交”和“虚拟访华”，让新科技拉近中外之间的距离。我们还通过开通推特账号，借助海外新媒体平台，增加与外界的交流互动。

**其次，走近人民，深入人心。**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法宝。人民外交工作也坚持在国际上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近年来，我们邀请各国前政要和外宾走进中国的基层，带他们踏上青藏高原，走进藏族人家；请他们参观安徽凤阳小岗村，亲身领略“敢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请他们走进“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感受中国人民完成脱贫攻坚的坚定决心，可以说是让来华的外宾“上山下乡”“深入基层”，真正让中外人民心相通。习近平主席说过，“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

我们也坚信人民友好的深厚力量能够跨越国界、跨越时空、跨越文明。

**再次，细处着手，润物无声。**人民外交往往于细微处见真章，潜移默化，直击人心。外宾以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所感，了解真实的中国。曾经有一位法国代表在参访结束时写下感言表示，通过来中国访问，更深刻理解了中国的发展成就来之不易却又理所应当。2021年，尽管受疫情影响，我们仍然组织了外宾进行多次虚拟访华，实现云参访，让中方有关部委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就绿色发展、台湾问题、涉疆问题等进行全面地介绍，尤其在外方关注的一些敏感问题上，让双方有机会深入细致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认知和理解。

**最后，勇担重任，强国有我。**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外交工作使命崇高、责任重大，人民外交责无旁贷。近年来，人民外交着力提高战略性，在外交政策的难点、痛点问题上，积极发挥“政策孵化器”的作用，积极同有关国家开展1.5轨和二轨磋商，提供政策建议。在官方交往不顺畅的时候，人民外交往往能够发挥稳定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当前中美关系发展遭遇困难，但美国的有识之士仍然希望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合作，两国人民也对中美重启友好交往抱有热切期盼。人民外交在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2021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了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基辛格先生亲自视频连线出席并讲话，活动引起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也展现了中美民间友好力量的正义呼声。

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人民外交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着国际上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风险挑战。我们将按照习近平外交思想指明的时代坐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外交工作全局，不断推动人民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一是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人民外交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以外界听得懂、听得进、听了信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人民外交将努力从“中国之治”和“中国之制”中深入挖掘生动鲜活故事，借助广阔交流平台，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展现中国人民的勤劳奋斗，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国

际情怀，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同、理解和支持。

**二是维护国家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回顾百年党史，我们曾遭受各种诬蔑、孤立和打压，但中国共产党从未被吓倒，而是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做正确的事、走自己的路。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我们难免要面对一些沟沟坎坎。面对个别国家和舆论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抹黑言论，人民外交要主动沟通、坚决斗争、伸张正义、激浊扬清，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

**三是推进中外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倡议，为人民外交提供了广阔空间。面对国际上起伏反复的疫情，面对国内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人民外交可以在更加宽广的领域促进民间务实合作，为国际抗疫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发展等搭建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落到实处。

**四是增进人民友好。**人民外交面向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随着外交参与主体的日益广泛，14亿中国人民都是人民外交的坚强后盾，外国政要、智库、学者、媒体、青年等都是人民外交的交往对象。我们要充分发挥人民外交的优势和特点，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更加充分地增进交流 and 理解，更加深入地沟通思想、传递友谊、加深互信，以诚待人、以信交友，让各国人民看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让人民外交成为国家关系的“润滑剂”、人民友谊的“播种机”。

疫情制造了物理阻隔，但却隔不断人心。我们坚信党领导下的人民外交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担当作为、善作善成，坚持胸怀天下，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努力。

【责任编辑：李 静】

# 积极开创新时代民间外交工作新局面<sup>\*</sup>

□ 林松添

## 一、民间外交的定位和历史贡献

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民间外交也是外交，也是国家行为，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外民相亲、心相通。对外工作中，除了官方的、半官方的，其他包括友好城市、企业、智库、媒体、社会组织和青年、妇女等自然人等都属于民间外交范畴和主体。民间外交具有主体多、领域广、资源丰、接地气、打基础等主要特点。

新中国民间外交具有光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间外交。新中国成立第二天，就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前身之一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拉开了新中国民间外交的大幕。随着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解放，中国民间外交团体不断增加，周恩来总理于1969年提出，“要建立一个人民外交机构，把民间团体的外交活动统管起来，建立一条人民外交渠道”。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本会随即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并在新中国外交面临困难时期，统筹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民间外交活动，在争取亚非拉国家广泛理解和支持，维护中苏、中俄友好关系，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为打破西方封锁、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

---

<sup>\*</sup>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在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讲话扩展而成，2021年12月20日。

要历史贡献。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本会工作。宋庆龄、邓颖超曾任本会名誉会长，刘少奇曾任中苏友协首任会长，本会负责联系的46家国别和地区友协中有18家由现任或前任国家领导人任会长。历届中央主要领导都出席本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或周年庆祝活动，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本会第十届理事会会议和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全国对外友协已建立了连接五大洲、互动国内外的丰富资源，为开展新时代民间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国对外友协拥有友好协会、友好城市、友好组织、友好人士“四个友好”，对外联系着46个国别和地区友协，对内联系着全国省市县友协，与世界上157个国家的413个民间团体和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统筹协调全国各地同五大洲139个国家建立了近3000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拥有一大批国际友人。

## 二、民间外交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外交蓬勃、迅速、全方位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领域多层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织密了全球朋友圈与合作伙伴网，已与世界上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也必然成了当今世界的焦点和亮点。

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全国对外友协的民间外交地位和作用日渐被边缘化。我们对民间外交的认识也存在缺位和温差，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缺位，民间外交的思想理论、政策指导、制度规范、体制支撑、系统统筹等顶层设计亟待完善和健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与时俱进。对外民间交往主要忙于迎来送往搞接待，促进了合作发展，但讲友好合作多，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外部世界客观理性、历史辩证地认知、认可、认同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理念、发展思想与巨大成就等对华认识问题；未能有效将中国发展理念与成就、市场优势、合作资源、文化价值等优势转化为中外友好

的坚实民意和社会基础，未能打通构筑对华友好民心工程的“最后一公里”。

事实证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中国经贸合作利益能有效转化为对华友好民意，如果对华友好的理性声音能在海外落地触动人心、形成主流民意，如果国际主流民意在中国一边，则煽动意识形态、恶意抹黑中国就没有听众、没有市场，个别国家就不敢随意编造谎言。当然，我们需要有“如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中国已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推动者、倡导者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践行者。民间外交也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新机遇。

一是党中央有期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工作并专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明确要求友协要发挥“三大作用”（即民间外交引领作用、公共外交骨干作用、城市外交桥梁作用），为本会找准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推动内外工作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形势有需要。疫情前，中国年出入境人员已超过3亿人次（其中，中美互访500万人次，中欧互访800万人次，中日互访1300万人次）。尽管西方发达国家舆论并不能代表国际主流民意，但在个别西方大国政客恶意抹黑打压下，西方对华民意出现了反华逆流，持续低迷。据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只有22%，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9个欧洲国家民众对华好感度平均只有25%；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甚至只有9%。可见，中国对外交往和经贸、人文合作优势没有有效转化为对华友好的国际民意和社会基础。改善西方对华民意，民间外交责无旁贷，理应担当尽责。民间外交工作不应仅停留在一般形式上的民间交往，而应体现民间外交的实质和内涵。

三是现实有条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创造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世界上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国、第二大消费国和海外投资、旅游主要来源国。面对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中治西乱”已成为全球大现实，“向东看”“东升西降”已成为世界大趋势，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优势。我们能把国家建设好，也一定能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民相亲、心相通，促进共同发展。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系统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和实现这一愿景的两大路径，一是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二是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些伟大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为人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根本遵循和思想引领。

可见，中国做好新时代民间外交工作，既有成功发展实践、丰富的物质基础，更有思想引领、共同价值理念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新时代民间外交大有作为、大有可为。

### 三、努力开创新时代民间外交新局面

2020年4月8日，本人就任全国对外友协会会长以来，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关于友协“三大作用”等重要指示的核心要义和深刻内涵，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推动本会从“办事者”向“谋事者”和“造势者”转变，带动全国友协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一，我们收集整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完成了友协对外工作“五个新”的总体框架设计，为发挥民间外交引领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根据新形势和党中央新部署新期待，我们经深入学习调研，提出了民间外交的新定位、新思路、新布局、新格局、新举措，解决“我是谁、为了谁”“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形成了“五个新”的总体框架设计，

完成了五年工作规划，积极推动对外民间交往向民间外交升级。

一是强调“民间外交也是外交，是落实国家总体外交的基础性工作”，以此作为本会民间外交的新定位。

二是根据本会职责使命，提出“一二三四五”的民间外交工作新思路，围绕促进中外民相亲、心相通的“一个中心”，构筑中外友好的利益基础和民意社会基础“两个支撑点”，发挥友协“三大作用”，聚焦友好协会、友好城市、友好组织、友好人士“四个友好”，努力开创“连接五大洲，互动国内外”的民间外交工作新局面。

三是按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提出民间外交新布局，统筹推进亚洲、非洲和中东、欧洲和拉美、美国等各方向民间外交工作。

四是根据新阶段新特点，推动构建“内外并举、上下联动、相互促进”的民间外交新格局，在继续做好海外工作的同时，做好外国在华企业高管、媒体记者、智库学者、留学生领袖等友好工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引导他们“在中国、爱中国、为中国”。全国对外友协不仅积极做好身边对外友好工作，还调动了地方友协、友城、友人的积极性，形成合力。

五是为破解外国人“看不懂”“听不懂”“读不懂”中国难题，提出并指导全国友协系统统筹各地参访资源，精心打造古色、红色、绿色、蓝色、炫色“五色参访路线”的民间外交新举措，分别展示中华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和脱贫攻坚成就、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创新发展成就与前景。截至目前，各地友协共报送参访点 1655 个、参访路线 157 条。

第二，我们努力解决“四有”难题，积极发挥公共外交骨干作用。本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友协要发挥“公共外交骨干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破解“有地方说、有人说、有人听、有人信”的“四有”难题，创新打造了一系列公共外交品牌活动，主动讲好中国故事。

一是紧扣建党百年主题，传承和弘扬国际主义精神。2021 年，本会及时

举办国际友人亲属读习近平总书记复信有感座谈会，清明节邀请国际友人亲属共赴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拜谒国际友人，组织国际友人亲属赴延安重走“革命路”等主题活动，重温了国际友人感人故事，弘扬了新时代国际主义精神，呼唤了“新时代斯诺”。

二是聚焦重点人脉，打造高端平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方式成功举办“2021从都国际论坛”，习近平主席发表视频重要致辞，王岐山副主席现场出席并致辞，来自五大洲的28位外国前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14国驻华使节等160余位嘉宾出席。成功举办李克强总理同“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29家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及高管视频对话会。

三是举办“我眼中的中国——地方行和领域篇”系列品牌活动。本会围绕国际舆论热点和总体外交需要，组织外国驻华使节、跨国公司高管、主流媒体记者、国际友人亲属、在华青年领袖等结伴赴湖北武汉、江苏无锡、山东、福建宁德、陕西延安、甘肃山丹、山西兴县、宁夏、新疆、湖南、青海等11个省地开展“我眼中的中国——地方行”系列参访活动，通过眼见为实、以实破虚，在中华大地上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还创办了“我眼中的中国——美丽乡村”全球短视频征集大赛，调动了24个省区市友协参与，收到40多个国家的360多个短视频作品，播放量超过8000万。

四是恢复“友好日”，重现“国际友人家”盛况。本会联合6省市友协时隔31年重新举办“友好日”活动，邀请包括22国驻华使节在内的69国在华人士等1000余位中外嘉宾共聚友协，并积极推动把全国对外友协打造成为“国际友人家”的新举措，重新开放艾黎故居，举办了艾黎事迹展、“呼唤新时代斯诺”等国际研讨会，筹备在友协大院塑立国际友人杰出代表雕像群，努力将本会打造成为弘扬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的宣讲基地、国际友人感人事迹的宣传基地、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

五是创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论坛。为贯彻和宣介习近平外交思想，呼吁国际社会与中国一道，同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路，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会创办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论坛，已经面向

拉美和加勒比、南太、南亚、澜湄国家、东盟、非洲等地区分别举办论坛，为外国驻华使馆、跨国公司与我地方政府、企业等对接合作发展搭建了平台。

六是做好中外媒体工作。一方面，我们同CGTN、《中国日报》、人民网、新华网、澎湃新闻等中央和地方主流涉外媒体结伴同行；另一方面，分批次邀请了亚非欧美15个国家的45家驻华外媒负责人或记者做客友协交流，组织中外媒体记者参加“我眼中的中国——地方行”参访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听懂”“看懂”“读懂”中国。

通过以上工作，本会已积累了一批能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海外友华人脉，解决“四有”问题初见成效。

第三，我们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国际友城工作，积极发挥城市外交桥梁作用。友城是国家关系落地见效的承载地，是打造人心、民心工程的重要载体。本会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友城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抓手，全面加强在全国友城工作的指导协调管理服务，着力将国际友城打造成地方对外开放的窗口、地方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载体、检验地方国际化程度的标杆。

一是提出了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国际友城工作的宏观指导政策和措施，为高质量推进友城工作提供政策引领和依据。

二是摸清了全国友城交往现状，分别建立了“地方”和“国别”两大友城数据库并实时更新，重新修订了《友好城市工作管理规定》，为加强友城工作依规指导协调管理服务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就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友城工作加强对各省区市工作的指导，形成了全国上下共同推进友城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四是创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举办各类双多边中外地方政府暨友好省市交流合作机制项目，调动各地积极性，同各大洲友城开展抗疫与经济复苏等主题的民间外交，保持城市外交的温度与热度。将牵头举办北京冬奥会友城合作发展论坛，推动各国友城共同唱响弘扬奥运精神的主旋律。

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友协“三大作用”，与各有关部

门和智库机构加强合作，同向发力，争取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新发展，做好“五个一”。一是凝聚一个共识，即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引领，推动国际社会认清人类面临疫情、气变、贫困、大流行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和亟需共同行动的迫切需要，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最广泛共识，高举人类发展旗帜。二是做实一个精神纽带，即坚持以弘扬儒家思想为精神纽带，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增进中外民相亲、心相通。三是唱响一个时代主旋律，即坚持以利弘义，以做实“一带一路”建设为牵引，深入贯彻全球发展倡议，协力推进国际友好城市高质量发展，调动地方、企业、智库、媒体等民间全领域协同对外交流合作，共同唱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旋律。四是办好一个论坛，即办好办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论坛，协力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五是打造一系列品牌活动和对华友好合作示范点，坚持以实破虚，做强“我眼中的中国——地方行和领域篇”等系列品牌活动；调动地方和民间资源，协力打造对华友好示范国家，以点带面，增强对华友好的说服力、向心力和凝聚力。

总之，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开创新时代民间外交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责任编辑：李静】

# 关于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sup>\*</sup>

□ 崔天凯

## 一、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认识和把握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变化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极为突出、引人注目甚至是举足轻重的部分。同时，世界那么大，不是只有中美两家。对于中美之间、大国之间的博弈，不能只看到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推动变局的有更深层次、更广泛影响、起更长远作用的力量和因素，比如说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格局调整、科技进步及其促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文化觉醒和复兴及其激发的碰撞和交融、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产生的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诉求，等等。我们要善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中抓住形势变化的方向、趋势和根本原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首先要看清历史正确的在哪一边，人类进步向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就是要我们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说明时，再次强调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当然是指导全党方方面面工作的，外交工作也不例外。我们日常处理的是一件件具体事情，但心里想的应该是大的格局，不能成为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这样，我们在对美和其他外交工作上，才能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

<sup>\*</sup> 本文根据外交部原副部长、前驻美国、日本大使崔天凯在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2021年12月20日。

例如气候变化问题，从表面上来看，炒得很热的似乎是自然界的挑战，自然界的挑战也确实客观存在的。但看得透一点、深一点，实际上事关科技的进步、产业的兴衰、产业链的调整，我们如果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观察和分析问题，就能够看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各国关于科技发展先手棋、未来产业竞争力、国际规则 and 标准演变的博弈。

最近，基辛格博士与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麻省理工学院苏世民计算机学院院长胡滕洛赫尔一起撰写出版了《人工智能时代和人类未来》。基辛格博士曾说过，同样是研究人工智能，搞技术的人关心的是应用（application），他关心的是影响（implication）。所以背景和经历很不相同的三个人共同写了这样一本书，去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及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这反映了他们对新事物的高度敏感——一个新事物出现后，他们马上就能做深层次、前瞻性的研究，把科技同政治、社会、人文甚至国际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我们应该认识到，科技创新及其应用，肯定会对人类社会各方面产生广泛影响，迟早会反映到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上。谁看得远、抓得早、准备得好，谁就有战略主动。这种对科技可能带来复杂影响及时予以重视的意识缺失，其实也是斗争意识的缺失，也是斗争精神的缺失。辩证唯物论本来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斗争利器，我们应该用得更好。

## 二、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 认识和运筹中美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一再指出，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把“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十条历史经验之一。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人民的向往和追求，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坚定不移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实际行动。是不是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能不能服务好

这个战略全局，是衡量外交工作包括对美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我们要时刻牢记的“国之大者”。这也就是我们对美斗争的“为何而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具体落实到对美工作上，我体会有几个方面要着力做好。

中美关系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间。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崛起。而且美国对华政策中是有种族主义因素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说罢了。美国势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甚至没有底线地对华打压、遏制、分化、围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充分的准备，应对好中美关系今后的曲折、动荡甚至“坐过山车”的场景。坚决维护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好14亿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维护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同时，既然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那么在斗争过程中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减少涉及利益和全局的代价和影响。原则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赌气仗，不打消耗战。人民的每一点利益都来之不易，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掠夺，也绝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大意、懈怠和无能使之遭受损失。

对于我们每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在对自己的要求上也要牢记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需要放在首位。外交工作、对美斗争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努力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越是艰险越向前”。面对挑战和诱惑，要放下个人得失荣辱，敢于担当，甘于吃苦；面对复杂的形势，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不要总想着当“网之红者”。我们的对手中有些是极端自私、没有良知的。而我们是共产党人，有理想信念、科学理论、宽广胸怀、高尚情操。我们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要战胜他们，在人格上也要打败他们。

### 三、如何在对外工作中更好发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要求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典范。他在对外交往中大量地、有针对性地、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中华民族文化经典，而且内化于很多论述和主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其实就蕴含着很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比之下，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差距还是很大的，改进的空间也是很大的。现在的问题是，往往是西方设置议题，我们忙着做文章。但是，用别人设定的话语体系来讲我们的故事，是很难讲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对外工作包括对美工作中是否已经充分发挥出来？怎样才能发挥得更好、更有效？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讲话和文章中多引用一些经典，更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境界、哲理、情怀、真善美融合进对外工作中，既能彰显其独特的魅力，又能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要求我们，“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我们以这样的精神努力做好对美工作，落实好党中央对美工作方针和部署，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责任编辑：李 静】

# “两个确立”是中国外交再创辉煌的根本保障

□ 阮宗泽

〔提 要〕“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而言，“两个确立”不仅是中国外交守正创新，科学把握世界格局演变趋势、破解时代难题的宝贵经验，而且是新征程上中国外交继往开来再出发，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营造有利国际环境，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保持战略主动、引领全球变革、创造更大辉煌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两个确立、大变局中开新局、新发展格局、全球变革

〔作者简介〕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2) 1 期 0035-17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sup>[1]</sup>“两个确立”是开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

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际取得的里程碑成果，是人心所向。作为21世纪最具世界意义的伟大变革，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今日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饱含深沉的“以人民为中心”情怀，时刻将14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心上。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质就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全球变革、推动全球发展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历史担当。

## 一、“两个确立”是中国外交创造辉煌的宝贵经验

“两个确立”是党自十八大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必将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强有力的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各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sup>[1]</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战略运筹，得益于“两个维护”。正是上述轰轰烈烈的伟大理论创新和光辉实践成就了“两个确立”。当前中国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踏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新征程，需要领导核心领航掌舵和科学理论指导。从此意义上讲，“两个确立”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5-26页。

使然，体现了开辟未来的导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sup>[1]</sup>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将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sup>[2]</sup>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国发展营造了有利外部环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把舵定向，观大势、谋全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国际形势做出精准、科学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sup>[3]</sup>上述对形势的分析充分体现了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正因如此，中国外交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书写了气势恢宏的篇章。中国成为世界大变局中的稳定锚。

新时代中国外交波澜壮阔、昂首阔步，成就斐然。习近平主席提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方案、新倡议，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0页。

[3]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第1版。

共建“一带一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对现有国际体制机制形成新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引领全球化朝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已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和宪法。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推动该理念向更多领域延展，被载入多项联合国决议等重要文件，国际认同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发展规律。有关方案已通过新的实践平台转化为具体而鲜活的合作成果，为国际关系的转型打上了中国烙印。《决议》高度评价十八大以来的外交工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sup>[1]</sup>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归功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导。由此可见，“两个确立”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两个确立”振奋人心，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向前的伟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保障。

第二，“两个确立”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强大武器。行百里者半九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又一次“赶考”。一方面，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百年大变局与世纪大疫情叠加，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界经济复苏脆弱，冷战思维、霸权主义有增无减，新矛盾新挑战接踵而至。而中国现代化事业正处于关键吃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上述内外形势演化都可能带来异常严峻的新考验。鉴此，我们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1页。

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有了“两个确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了主心骨、有了定盘星，就能汇聚成磅礴力量，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向人民和历史交出优异的答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积极将“两个确立”转化为“两个维护”的自觉，不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和战略部署以及对中国外交的科学指导，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二、大变局中开新局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与机遇交织，处理得当，可以化危为机，反之则可能错失良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观察形势，见微知著，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充分把握战略主动，赓续前行，奋楫争先。从历史上看，中国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争取主动。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勇气，以改革开放为先导，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主动作为，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协调合作，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科学决策、果断行动，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实现经济由负转正增长，率先部署新发展格局，巩固了中国抵御风险挑战的韧性，增强了化危为机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充分发挥主场外交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时，习近平主席通过“云交流”，与众多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进行通话或视频会晤，以视频或书面致辞方式在国际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引领方向，充分展示了中国和平发展开放合作的大国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国际形象和身份更加立体多元。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sup>[1]</sup>

### （一）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中国坚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是时代潮流。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对外政策均建立在上述信念的基础之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两者相得益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力量壮大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又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主张和为贵。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没有主动发起过一场战争或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sup>[2]</sup>在冷战期间，中国就敏锐捕捉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大势，毅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成功，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增强了国际社会对和平的信心。中国还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向一些冲突中国家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中国将一如既往站在和平与正义的一边，积极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sup>[3]</sup>30多年来，中国已累计派出5万多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sup>[4]</sup>

### （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中国既着眼于自身的发展，又着眼于全人类的发展。2021年，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不仅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也前所未有地

---

[1]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版。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3] 《王毅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19年9月29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9/29/content\\_5434533.htm](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9/29/content_5434533.htm)。

[4] 《魏凤和在第四届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上作视频发言》，国防部网站，2021年12月7日，[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1-12/07/content\\_4900636.htm](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1-12/07/content_4900636.htm)。

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战胜贫困的信心。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位居世界榜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引擎。中国倡导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获得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已成为“减贫之路”“增长之路”“健康之路”“数字之路”。中欧班列成为国际抗击疫情的“生命通道”，对恢复沿线各国经济亦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大力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各国一道促进全人类和平与发展。中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各国分享更多发展红利，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中国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积极促成《巴黎协定》，提出“双碳”目标，宣布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一系列新举措，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展示了大国担当。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推进落实 2040 年愿景，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sup>[1]</sup>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的 30 年是聚焦发展、成果卓著的 30 年。如今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潜力无穷。中国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RCEP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将成为亚太各国经济恢复、区域一体化合作提质升级的助推器。

### （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旗帜鲜明地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世界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sup>[2]</sup>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各国主权平等，没有人可以居高临下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认为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而非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则，任何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内行事，不能自行其是、另搞一套。大国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

[1]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3 日，第 1 版。

[2] 同上。

这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sup>[1]</sup>“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2]</sup>维护联合国权威，就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sup>[3]</sup>唯有如此，才能维护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四）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在百年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担当和宏阔视野，进行制度创新，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献计献策。在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并成为世界最大疫苗提供者。在2021年5月的全球健康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支持全球团结抗疫的五项举措，指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施策，统筹系统应对；坚持同舟共济，倡导团结合作；坚持公平合理，弥合“免疫鸿沟”；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治理体系。<sup>[4]</sup>在同年8月由中国主办的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书面致辞，宣布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在同年10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详细阐述了疫苗合作行动的路线图。<sup>[5]</sup>中国是向世界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亿剂疫苗。中国疫苗在助力各国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各方广泛欢迎和高度认可。中国同30个国家一道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sup>[6]</sup>有助

---

[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6日，第1版。

[2]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6日，第1版。

[3]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第1版。

[4] 《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8月6日，第1版。

[5] 《习近平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5月22日，第1版。

[6] 同上。

于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免疫鸿沟”。

为更好统筹疫情反弹与经济复苏的关系，必须将发展作为优先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愿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加强全球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等领域合作，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sup>[1]</sup>无论是全球发展倡议还是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均紧扣发展议题，是中国提出的又一全球公共产品，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增长注入动力。迄今，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明确表示支持倡议，愿同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倡议落实。<sup>[2]</sup>

###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 保持战略主动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光辉理论和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主动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创造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大机遇。

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乘势而上、化危为机

---

[1]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2日，第1版。

[2] 《2021年11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年11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918899.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918899.shtml)。

具有重大意义。<sup>[1]</sup>

### （一）在大变局中开新局、大危机中育新机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必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奋进新作为的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sup>[2]</sup>“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sup>[3]</sup>如果说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兴办特区，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那么今天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则具有异曲同工之意。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通，相互促进、强化必将释放磅礴的力量，可以增强我们应对不测的韧性，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sup>[4]</sup>

### （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在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马不停蹄地将目光锁定在共同富裕目标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1]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1年5月12日，第7版。

[2] 同上。

[3]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5日，第1版。

[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sup>[1]</sup>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sup>[2]</sup> 中国的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信念，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主席在向美国总统拜登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时指出：“作为中国领导人，我能够为 14 亿中国人民服务，同他们一起创造美好生活，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我的态度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sup>[3]</sup>

针对疫情不断反复，中国在全球大力开展抗疫外交，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向世界提供慷慨帮助，同样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中国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疫情危机的能力，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习近平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sup>[4]</sup> 在国内，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在国际上，中国主张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 （三）以开拓进取的大国外交化解外部风险挑战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对中国进行全领域、全方位的围堵打压，不断虚化“一个中国”原则。拜登政府拉帮结派，搞“伪多边主义”，颇具欺骗性。美国心存幻想，一边竭力遏制打压中国，升级制裁对抗，另一边又声称要建立“护栏”防止失控。在美国的倒行逆施下，中美关系受到全面冲击和严重挫折。对此，中国坚决反击美方的挑衅，打掉美方幻想，同时把握主动、晓以利害，积极引领中美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11 日，第 1 版。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 2021 年 7 月 15 日电。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4]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10 月 13 日，第 1 版。

中美元首保持接触沟通，通过电话和视频会晤交流，有助于管控分歧，稳定双边关系。2021年2月和9月，习近平主席两次同拜登总统通电话，均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sup>[1]</sup>拜登表示，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化，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如何互动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sup>[2]</sup>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两国元首都认为，此次会晤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有利于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信号。<sup>[3]</sup>中美两国高层还分别在安克雷奇、天津、苏黎世和罗马进行了激烈交锋。中国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并向美方开出“两份清单”，划出“三条底线”，有力回击了美国“长臂管辖”，有效地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

中俄关系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成为“21世纪国家间协作的典范”。2021年8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通电话，双方同意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一系列新成就，为促进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团结国际社会共克时艰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sup>[4]</sup>同年12月，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俄关系，并表示将推动两国关系持续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展现出巨大政治优势和机遇优势，中国愿同俄方一道，共同开启后疫情时期中俄关系崭新篇章。<sup>[5]</sup>中俄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相互支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持相同或

---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11日，第1版。

[2] 同上。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8月26日，第1版。

[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6日，第1版。

相近立场。普京表示，俄方将最坚定地支持中国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借涉台问题损害中方利益，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组建任何形式的“小圈子”，任何挑拨离间俄中关系的图谋都不会得逞。<sup>[1]</sup>中俄还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准则和两国正当权益，坚决反对披着“多边主义”和“规则”外衣的霸权行径和冷战思维。中俄经贸关系保持增长势头，2021年贸易规模有望再创新高。

中欧关系展现强大韧性，面临新的发展契机。热衷于大国竞争的拜登政府一方面加大对欧洲盟友的拉拢，企图分化中欧关系，另一方面组建与英国、澳大利亚的安全同盟，对法国“背后捅刀”，使欧盟国家日益认识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分别与德国、法国、英国、欧盟、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保持沟通交流、互动频繁，共同倡导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欧要通过持续高层沟通对话，增进了解互信，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加强对中欧关系的政治引领，确保中欧关系行稳致远。<sup>[2]</sup>默克尔表示，欧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自主，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更加需要德中、欧中合作应对；德方重视中国“十四五”规划，期待其为德中、欧中合作带来新的重要机遇。<sup>[3]</sup>

## 四、引领全球变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21世纪最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作为这场大变革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就诞生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和开创性。“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2]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7日，第1版。

[3]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8日，第1版。

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sup>[1]</sup>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无先例可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面临全新考验。正缘于此，中国道路之探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将注定引领全球变革。

### （一）中国发展道路拓宽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综观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是欧洲列强还是美国、日本等国，均以殖民扩张和战争掠夺方式实现现代化。传统的现代化代理理论局限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缺乏对发展中大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支撑，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没有现成的脚本。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尚有实现完全统一的重任，外部环境的复杂尖锐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一条崭新的道路，也是一条崎岖坎坷之路。因此，中国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大变局之下顺应时代之变，主动谋变，在变化中创造机遇，在机遇中创造奇迹。中国绝不能复制西方列强靠战争崛起的方式，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悲惨遭遇让中国格外珍惜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遭受列强的侵略、凌辱、掠夺达百年以上，但中国人民不是从中学到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sup>[2]</sup>

实践证明，中国在探索人类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意义非凡。迄今为止，即使将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0亿人左右，属于全球70多亿人口中的少数，而中国的成功就意味着14亿多人口进入现代化，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部人口还多。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桎梏，找到了一条惠及数十亿人的现代化之路，对发展中国家是巨大的鼓励，也必将引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全球变革。

### （二）中国叙事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标识

中国通过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

[1]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6页。

[2]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第2版。

为引领人类发展走向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合作观、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一带一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世界大变局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契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疫情大考让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更加凸显。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是破解当今时代难题的钥匙，是对西方标榜“普世价值”的有力反击。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并提供公共产品，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sup>[1]</sup>在其后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重申，我们要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sup>[2]</sup>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有助于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2021年12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高票通过了联大一委提交的决议，决议序言段强调应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联大决议连续第五年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sup>[3]</sup>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2]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1版。

[3] 《2021年12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年12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112/t20211208\\_10464195.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112/t20211208_10464195.shtml)。

### （三）中国民主人权理论实践引导国际社会树立正确的民主观、人权观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sup>[1]</sup>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中国民主人权得到最好保护和发展的10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发展促进人权，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权发展道路，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14亿多中国人民在人权保障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sup>[2]</sup>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目标，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这既是中国人权事业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权事业的胜利。“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精神，坚持把人权普遍性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为中国人权进步和国际人权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sup>[3]</sup>

“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如何更好实现民主，只能由本国人民来评判。”<sup>[4]</sup>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人权之路，获得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是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伟大飞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系统介绍了中国民主的价值理念、发展历程、制度体系、参与实践和成就贡献，鲜明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推动中国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中的作用。<sup>[5]</sup>

长期以来，美国把西方“民主”标准强加于人，以“人权”为由干涉别国内政，日益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美国召集所谓“民主峰会”，以“民主领袖”自居，对各国民主制度说三道四，假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美国政府对疫情的失败应对，迄今已导致逾80万人死亡，国内的种族歧视、不平等现象等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习近平向2021·南南人权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1年12月9日，第1版。

[3]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第5版。

亦暴露了美式“人权”“民主”的虚伪本质。美国发动多场战争，屠杀平民，更是对民主人权的公然践踏。对此，中国一方面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揭露美国阴暗丑恶的一面，另一方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积极发声，使联合国机构成为揭露和声讨西方“民主”“人权”黑历史的舆论场。

## 五、结语

“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再接再厉，创造更大荣光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丰富的原创性思想，指导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作为一场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进行的最恢宏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开创性探索，也是21世纪最具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伟大变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不断作出新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捍卫“两个确立”，胸怀两个大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往开来、劈波斩浪、昂扬奋进，始终把握战略主动，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坚定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书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华章。

【完稿日期：2022-1-8】

【责任编辑：李静】

# 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内涵、 特征与弘扬路径

□ 邢丽菊 鄢传若斓

〔提 要〕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着眼于全球化发展大势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而提出的普遍性价值，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国情，具有承继性、创新性、包容性、时代性、先进性等特征，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应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文明互鉴。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鄢传若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2) 1 期 0052-15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sup>[1]</sup>此后，习近平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sup>[2]</sup>

[1]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2] 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2021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通电话、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第六届中非民间论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

强调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sup>[1]</sup>“引领人类进步潮流”，<sup>[2]</sup>呼吁各国政党领导人“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sup>[3]</sup>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合了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的差异，跨越了不同文化的隔阂，汇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政治制度优秀的共同价值，指出了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共同理想和价值目标，开辟了化解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纷争的文明交流互鉴新境界。

##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内涵与内在逻辑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创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严密的内在逻辑。

### （一）和平

和平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理想的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和平放在第一要义，凸显了和平之于其他问题的重要性。《联合国宪章》首章开宗明义指出，联合国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空前浩劫，美苏冷战又使人类长期被核战争阴影笼罩。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世界肆意发动军事战争。战争和动乱给人类造成巨大伤痛，也使人类更加珍视和平稳定。中国人民对和平十分珍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先后写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而且载入党章和宪法，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3]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

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sup>[1]</sup> 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的决心。中国外交不仅追求自身的和平发展，还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视为神圣职责，坚定引领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高度重视各国共同和平发展的意义。他指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sup>[2]</sup> 他还强调，“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sup>[3]</sup>

## （二）发展

发展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个人生存价值的体现。没有发展就没有进步。只有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社会生产力才会得到提高，进而为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反之，社会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个人发展。中国主张，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哪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少，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习近平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sup>[4]</sup> 他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sup>[5]</sup> 习近平提出了新发展理念。针对国内发展，他指出，“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sup>[6]</sup> 他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同时强调“都要予以关注，使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能畸轻畸重，不能以偏概全”。<sup>[7]</sup>

---

[1]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

[2]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第1版。

[3] 同上。

[4]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1日，第1版。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2版。

[7]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人民日报》2021年1月30日，第1版。

### （三）公平

公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然会带来物质利益的分配，这是构成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公平要求保障各利益攸关方的权益，最大程度实现劳动成果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中国的公平观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国内而言，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合理分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公平分配视为小康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建立以“三个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就国际而言，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主张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以公平为要义，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小圈子意识”和“赢者通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努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前进。习近平认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sup>[1]</sup>他将实现社会公平视为改革的关键步骤和最终目的。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sup>[2]</sup>习近平强调要在国际社会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并将公平正义作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

### （四）正义

正义是对社会的道义担当。“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作为契约精神的正义要求坚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顺应时代潮流的事情。中国的正义观对内要求在收入分配、执法守法、法治建设中体现道义担当，不断促进社会朝着正义和法治方向发展；对外要求捍卫国际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只有在国际体系中坚决捍卫和实践多边主义，才能更好解决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国际规则不应由少数人制定，国际合作不应以小集团利益为出发点谋求霸权，应践行公平正义。习近平高度重视在国际关系中坚守正义，认为正义与国际和平紧密相连。2020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2] 同上，第96页。

年11月，习近平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提出倡议：“秉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行径，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和和平安全。”<sup>[1]</sup>2021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要坚守正义，开创互尊互鉴的未来。……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sup>[2]</sup>

### （五）民主

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全人类的共识。但民主的形式及制度并无普世、不变的标准。民主是人类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

一个国家是否民主，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民主虽是广泛而自由的，但需要有法制来约束，民主和法制缺一不可。习近平高度重视民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3]</sup>他认为民主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参与实践。“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sup>[4]</sup>

### （六）自由

自由是人的社会价值的至高追求。人之自由是现实而具体的，不存在脱离现实的抽象自由。只有实现了人的真正充分发展，才意味着获得了自由。真正的自由建立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联

---

[1] 习近平：《共抗疫情，共促复苏，共谋和平——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的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第3版。

[2] 习近平：《同舟共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2版。

[3]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联合国宗旨是“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与基本自由之尊重”，联合国大会要“助成全体人类之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实现”。<sup>[1]</sup>这足以说明，对自由的追求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国提倡将个人自由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期实现更高层次的意志自由和精神自由。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还为增进人类整体福祉、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奋斗。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实践《共产党宣言》“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最高理想的生动体现，也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必然追求。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自由观念。习近平多次强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为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奋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应当享有自由发展的权利。他反复强调，“要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现实问题，关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关爱贫困民众，让每一片土地都孕育希望。”<sup>[2]</sup>

综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大要素。这六大要素并非孤立，而是个人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目标，公平是实现发展的保障，正义是对社会的道义担当，民主是人的政治价值的实现，自由是人的社会价值的追求。历史发展规律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将助力社会的发展进步。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人类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相互交汇的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更加需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齐心协力，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真实而具体地体现到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实践中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下，本着找到共同利益汇合点的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够顺利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唯一可以超越当今世界文化同质与异质对立逻辑的普遍性价值。

---

[1] 《联合国宪章（全文）》，详见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2]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

##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特征与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同时结合中国近代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实践，对其进行了高度融合和凝练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体现文化的传承发展，又突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擘画了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

### （一）继承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之一。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而不同”要求既肯定和接受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和接纳事物的差异性。中华文化中的“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是和平的基础；“生生之谓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教无类”是公平的基础；“天下为公”要求不以谋取私利为处世原则，是正义的基础；“民贵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可看作民主的基础；“从心所欲，不逾矩”体现了人的精神和意志的自由，可视为自由的基础。除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传统文化基因外，尤其要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民主和自由的因素。在中国古典中，“民主”最早出现在《尚书》：“天惟时求民主”。《尚书》还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只要是人民的意愿，连上天都要顺从而不违背，这就意味着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孔子说“节用而爱民”，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西汉贾谊主张“民为万事之本”。中华文化中诸如此类的民主基因，为近代西方民主传入提供了土壤。中国儒家、道家高度强调人的自由。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的意志自由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老子的“道法自然”虽有自然规律之意，但也包含自然而然的自由状态。庄子《逍遥游》“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更是将这种自由展现的淋漓尽致。而西方的自由认为，人生来是不自由的，需要某种外在力量（神或上帝）把人从不自由的状态解放出来，

然后赋予自由。这与中国文化强调自得自在的自由有很大区别。<sup>[1]</sup>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源泉，其本身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价值理念的普遍意义。

马恩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论述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理论源泉。例如，马克思视和平为人类社会重要的价值追求，实现和平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关键目标，只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和平。关于正义，马克思认为，“正义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在互相交往中，在任何地方为了不伤害和不受害而订立的契约。”<sup>[2]</sup>关于民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sup>[3]</sup>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贯彻与实施民主，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sup>[4]</sup>他主张，建立新型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关于自由，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内涵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5]</sup>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运用唯物史观指出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sup>[6]</sup>尽管经典作家对相关概念的认识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而且往往具有较鲜明的阶级性，但相关论述普遍触及问题的核心与本质，具有长远的理论或哲学含义，因而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理论来源。

全人类共同价值也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智慧。毛泽东曾强调，“不

---

[1] 张允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第75-7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1页。

[4]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6]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sup>[1]</sup>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和平为上”<sup>[2]</sup>的外交原则。邓小平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强调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一是取决于国内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二是取决于国际持久的和平环境。<sup>[3]</sup>毛泽东认为独立和民主是全国人民最需要的东西。<sup>[4]</sup>他还强调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的侧面。”<sup>[5]</sup>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sup>[6]</sup>他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认为争取自由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目的。他还继承了恩格斯的观点认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sup>[7]</sup>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和平、民主、自由等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情怀和担当，不但指导了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国家建设，而且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也自然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精华。

## （二）创新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创新。中国革命文化孕育于爱国启蒙运动中，成长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实践中。从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战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从而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增添了新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又丰富了革命文化的内涵，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发展的进步思想。在当今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集中表现形式。它把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61页。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文明、和谐以及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有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需求融为一体。这是中华优秀价值理念的系统性总结和结构性呈现，是文化遗产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同时又吸纳了世界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充分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涵。

### （三）包容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来源于中华文化素有的和平、发展等价值传统，又吸收借鉴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及西方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实现了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更好地体现了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文明本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文明，只有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东西文明交汇融合的包容性，体现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追求，体现了对不同国家探索价值实现路径的尊重以及对不同国家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支持。它与联合国发展目标高度一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准绳。

### （四）时代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大要素在东西文明史上早就有其基因，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乏相关论述，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与今天迥异。时代发展赋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更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全人类共同价值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等重大战略论断，既反映了个人对生存发展的追求，也浓缩了世界各国处理彼此关系的普遍共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抬头等多重危机，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国际社会抛弃偏见、共同合作，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

### （五）先进性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宣扬“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并将其鼓吹为“普世价值”，打着“普世”旗号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其在全球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使“普世价值”沦

为其谋求世界霸权的口号与工具。西方“普世价值”在西方世界都没能做到真正普遍适用，甚至严重违背了其在立国之初颁布的法典制度，而且具有明显理论缺陷，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张，现实的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的本质不是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意味着，不但不同时代具体的人性是不同的，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不同社会关系下的具体人性也是不同的。西方“普世价值”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强调民主、自由、平等的超阶级性和超社会性，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为准则来否认人的阶级性和历史性，<sup>[1]</sup>实际上就是将人的发展纳入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普遍性文明轨迹。这种人性论不顾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成员的差异性，固执坚持人类因具有共同的人性基础，故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价值准则，并以此替代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价值，显然是个伪命题。

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反映了各国人民对共同发展问题的认知和探索，突破国家本位主义和民族至上主义的藩篱，具有真实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强调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利益主体依存度越来越高。而西方“普世价值”的特征是抽象性、排他性和封闭性，一味强调西方中心主义，视自己为上帝的“特选子民”，力图排斥甚至颠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国家。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它。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sup>[2]</sup>因此，基于各国共同的价值追求、解决人类发展之需、促进世界和平进步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的扬弃与超越，具有西方价值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发展鸿沟日益加剧，各种政治思潮交锋激荡，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一系列共同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抛弃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陈词滥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价值的内涵，为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

[1] 陈文旭、易加乐：《作为虚假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4期，第183页。

[2]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7页。

### 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可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 （一）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愿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体来说，在政治上，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经济上，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其对国际社会取得共识、凝心聚力具有促进作用，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既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贯彻落实，同时也是对其最有效的弘扬传播。

#### （二）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包含三个关键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强调的是要摒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尊重各

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国家内政。公平正义强调的是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要尊重彼此关切、照顾彼此利益，推动制定平衡反映各方利益和关切的国际规则，确保各国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基本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诉求。而合作共赢强调的是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基础，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必将对其弘扬传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 （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具有约束力和有效性的国际制度或机制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sup>[1]</sup>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sup>[2]</sup> 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sup>[3]</sup>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

---

[1] 石斌：《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31页。

[2]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3] 《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第1版。

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sup>[1]</sup>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呼吁合力破解全球治理“四大赤字”：“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sup>[2]</sup>显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必将有助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 （四）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与实践平台。<sup>[3]</sup>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sup>[4]</sup>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付诸实践，努力把物理联通与理念联通融合起来，使共商共建共享进一步转化为多赢共赢的合作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解决发展问题，在解决发展问题中实现公平正义，进而为真正实现和平、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提供物质保障。

#### （五）积极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各民族孜孜以求的目标。由于生态环境和历史来源不同，不同文明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2] 习近平：《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2019年3月26日在巴黎中法全球治理理论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0-462页。

[3] 习近平：《共同绘制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2018年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86-487页。

[4]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第3版。

的价值观存在差异,但在上述核心价值问题上应该大同小异。这也构成了各国、各民族交流对话的基础。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sup>[1]</sup>中国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意在强调各民族、教派、政党、国家“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理性看待彼此差异,并学习如何和平共处。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交流互鉴越频繁、越深入,彼此之间也就越认同、越尊重;反之,交流互鉴越稀少、越肤浅,相互之间也越容易误解,越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无论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还是促进中外关系,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我们都应当把加强与各国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放在重要位置上。

#### 四、结语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优良传统的传承。它引领中国外交站在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的道义制高点上,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零和博弈等冷战思维形成鲜明对比。<sup>[2]</sup>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对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境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而且切实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期待和共同诉求,为国际社会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可信的共同纽带,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

【完稿日期：2022-1-10】

【责任编辑：宁困辉】

---

[1]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及其局限<sup>\*</sup>

□ 严少华

〔提 要〕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欧美对华政策的转型，中国因素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维护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欧美加快了对华政策协调的步伐，试图围绕意识形态、经贸投资、科技创新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协调共识并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有别于过去“美主欧从”的模式，呈现出更机制化和更全面的新特点。在协调的过程中，欧美对华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趋同，但分歧也显露无疑。欧美对华认知与政策分歧、欧盟“战略自主”倾向以及“特朗普主义”遗产的影响都将对欧美协调的深度和效果构成制约。当今国际体系的特点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也决定了欧美协调难以复制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和平共处”是欧美协调和中美欧三边关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欧美协调、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欧美关系

〔作者简介〕严少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2) 1 期 0067-17

对华政策已成为欧盟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议程。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欧盟也在推动形成统一的对华战略。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

<sup>\*</sup> 本文是外交部中欧关系研究“指南针计划”2021年度课题“2020美国大选后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动因、前景与影响”（项目号：KT202102）和复旦大学2020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拜登执政背景下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研究”（项目号：IDH3057019/008）的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编辑部和吴心伯、叶江老师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以及欧美对华政策的转型,中国因素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成为当前欧美双边关系的主要关切之一。拜登执政后,回归盟友体系与多边主义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显著特征,欧美之间加快了对华政策协调的步伐。在跨大西洋关系升温的背景下,欧盟成为影响中美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之一,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攸关国际格局变化与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因此,认识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新态势与新特点,分析其动因与走向,对中国研判未来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形成大战略思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新态势

欧盟与美国作为盟友,在对外政策上本来就有协商与合作的传统,在对华政策上进行协调也并不罕见。冷战期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就成立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21世纪初,欧美也围绕在东亚应对中国崛起进行了早期互动。<sup>[1]</sup>但在跨大西洋关系中,中国并非传统上的核心议题,欧美更关注中东问题、俄罗斯的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近年来,在中美竞争以及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因素”逐渐成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欧美关于跨大西洋关系中“中国因素”的探讨也越来越多。有学者指出,中国议题同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一起成为强化跨大西洋关系的三个重点议题,即所谓“3C”(Climate, Covid-19 & China)。<sup>[2]</sup>

长期以来,中国议题在跨大西洋关系中都是分歧的来源之一,甚至引发双边关系的紧张。<sup>[3]</sup>但随着中国议题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流化”以及跨大西洋两岸关于中国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欧美在对华政策协调与合作上的

---

[1] 赵怀普:《冷战后欧美在东亚的战略互动初探》,《欧洲研究》2014年第1期,第53-70页。

[2] Gesine Weber, “Biden’s China Challenge Starts in Paris and Berlin,”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3, 2021, [https://www.gmfus.org/blog/2021/03/03/bidens-china-challenge-starts-paris-and-berlin?utm\\_source=email&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ww](https://www.gmfus.org/blog/2021/03/03/bidens-china-challenge-starts-paris-and-berlin?utm_source=email&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ww).

[3] Julie Smith et al., “Charting a Transatlantic Course to Address China,”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2020, p.2, <https://www.gmfus.org/news/charting-transatlantic-course-address-china>.

共识也逐渐增强。这种共识体现在官方、智库和民间多个层面。在官方层面，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合作的共识有所增强。2020年1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跨大西洋合作应对中国具体计划》报告，认为美国与盟友合作应对中国是“当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并提出了具体合作的领域。<sup>[1]</sup>同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新的政策文件《全球变局下的欧美关系新议程》，作为美国大选后加强跨大西洋合作的蓝图，包括对华政策合作。<sup>[2]</sup>在智库层面，欧美对所谓“中国挑战”的共识增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中国挑战”正成为欧美智库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如美国亚洲协会与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在七个领域对欧美构成了现实或潜在的共同挑战，其中既包括经贸、人权与安全等传统议题，也包括技术、互联互通、海外影响以及全球治理等新兴议题。<sup>[3]</sup>在民间层面，欧美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有所加强。据相关民调显示，跨大西洋两岸多数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多于合作伙伴”，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在人权、气候变化与网络安全等议题上。<sup>[4]</sup>

在对华共识增强的背景下，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呈现出更机制化和更全新的特点。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不仅有一个独特的机制化平台——欧美中国问题对话机制（EU-US Dialogue on China），<sup>[5]</sup>而且覆盖的议题也更为全面和广泛，涉及意识形态、经贸投资、技术创新、地缘政治及全球治理等

---

[1]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A Concrete Agenda for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on China,” November 2020, p.7, <https://www.govinfo.gov/app/details/CPRT-116SPRT42155/CPRT-116SPRT42155/context>.

[2]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JOIN (2020) 22 final, Brussels, December 2,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279](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279).

[3] Bernhard Bartsch et al., “Deal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 as a Transatlantic Challenge,” Bertelsmann Stiftung, June 2020, <https://asiasociety.org/center-us-china-relations/dealing-dragon-china-transatlantic-challenge>.

[4] Irene Braam and Alexandra Scheffer, “Transatlantic Trends 2021: Transatlantic Opinion on Global Challenges,”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1, pp.29-34, <https://www.gmfus.org/news/transatlantic-trends-2021>.

[5] 该机制由欧盟于2020年6月15日提议，2021年5月26日正式启动，是第一个由欧盟与美国官方发起的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双边对话机制。

多个领域。

### （一）意识形态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突破口

相似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是欧美之间最坚固的纽带，而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批评和防范则是欧美之间最大的共识，因此意识形态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尤其是拜登上台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重新回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其极力拉拢欧盟构建对华“价值观联盟”。在意识形态领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采取行动。

一是强化对华“人权外交”，协调“人权制裁”。在对华人权外交上，欧美由传统的以对话为主，逐渐转向对抗性的制裁手段，并协调出台了以“人权制裁”为主题的相关法案。拜登执政后，欧美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力度明显加大，涉疆、涉藏、涉港等议题成为欧美对华“人权外交”的重点，欧美在涉华人权议题上的互动与合作也更加明显。2020年3月，欧盟、美国、英国与加拿大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和警告，联合对中国新疆地区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这是欧盟30多年来第一次对中国实施制裁，也是拜登上台以来欧美协调对华政策最明显的体现，表明人权问题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强化价值观纽带，构建所谓的“民主联盟”。近年来，欧美从意识形态视角协调对华政策的倾向更加明显，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从“存异”逐渐转向“求异”，刻意突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乃至“威胁”。这实际上反映了欧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防守心态。为了应对中国的所谓“制度竞争”，欧美开始强化价值观纽带，试图构建“民主联盟”，打造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愿景。<sup>[1]</sup>拜登倡导的“民主峰会”是构建“民主联盟”的重要路径。2021年12月，美国召开了包括欧盟在内的“民主峰会”，其目的一方面是强化价值观纽带，构建“民主联盟”，另一方面也是企图在意识形态上“异化”中国，将与中国关系强行置入所谓“民主 vs 威权”的简单框架。

---

[1] Antony Blinken and Robert Kagan, “‘America First’ is only Making the World Worse. Here is a Better Approach,” Brookings, January 4,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1/04/america-first-is-only-making-the-world-worse-heres-a-better-approach/>.

## （二）欧美在经贸领域协调双边分歧，共同强化对华经贸政策工具

经贸与投资是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核心议题。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政府补贴以及投资安全等领域，欧美有着共同关切，但协调不足。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争端，更让欧美在经贸领域的协调一度陷入困境。2020年12月，欧盟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引发美方对欧美协调的质疑。<sup>[1]</sup>但拜登上台后，与欧盟协调对华经贸政策成为其施政重点之一。2021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拜登政府任内首个贸易议程。报告强调拜登政府将“与朋友和盟友协调，向中国政府施压并要求其停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sup>[2]</sup>在经贸投资领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呈现出两种新的趋势。

一是以应对中国为由协调欧美双边贸易分歧。欧美正利用中国因素推动解决双边贸易分歧，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在公布任内首个贸易议程后不久，拜登就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宣布暂停因飞机补贴争端而实施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并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解决这个持续了16年的争端。<sup>[3]</sup>欧盟与美国表示，将继续通过谈判达成全面而持久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必须考虑来自中国的竞争。<sup>[4]</sup>2021年6月欧美峰会之后，欧盟与美国达成“空客一波音协议”，将价值高达115亿美元的飞机关税豁免五年。欧盟与美国还表示将加强协调，共同分析和应对“来自第三方的可

---

[1] Steven Erlanger, “Will the Sudden EU-China Deal Damage Relations with Bide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06/world/europe/eu-china-deal-biden.html>.

[2]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2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0 Annual Report,” March 1, 2021,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21/2021%20Trade%20Agenda/Online%20PDF%202021%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and%202020%20Annual%20Report.pdf>.

[3]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Call with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March 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5/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european-commission-president-ursula-von-der-leyen/>.

[4] Philip Blenkinsop and David Lawder, “US, EU Agree Tariff Freeze in Aircraft Dispute, Eye China,” *Reuters*, March 6,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eu-idUSKBN2AX22A>.

能损害大型民用飞机产业的非市场行为”。<sup>[1]</sup> 欧美贸易争端的缓和也为双方协调对华经贸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是共同强化对华经贸政策工具。在2021年9月举行的“欧盟—美国贸易与技术理事会”（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匹兹堡会议上，欧美就强调要“特别注重利用和协调各自的贸易政策工具”应对全球贸易挑战。<sup>[2]</sup> 2021年12月，欧美第二轮中国问题对话在经贸领域重点讨论了增强经济弹性、促进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应对“经济胁迫”等议题。尤其是“反经济胁迫”工具，成为欧美强化对华经贸政策工具的重点。美国与欧盟先后在2021年10月与12月推出了“反经济胁迫”相关法律草案。<sup>[3]</sup> 此类法案赋予欧美在面临第三国“经济胁迫”时采取反制的权力，可能给中国与欧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 （三）技术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新方向

拜登政府明确将科技竞争置于中美关系的核心，欧盟也在其新的战略文件中将中国视为“追求技术领导力的经济竞争者”，因此技术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新方向。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巨大并且可以集中资源发展关键性的技术，欧美意识到单独应对中国在技术上的挑战会越来越困难。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可以建立“Tech 10”联盟，协调技术开发、使用及获取方面的立场。<sup>[4]</sup>

在技术领域，TTC正成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机制化平台。2020年12月，欧盟在其《欧美关系新议程》文件中呼吁欧美确立“共同技术议程”，

---

[1]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US Take Decisive Step to End Aircraft Dispute,” June 16,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300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3001).

[2] “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Inaugural Joint Statement,” Pittsburgh, September 29, 2021, p.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1\\_495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1_4951).

[3] US Congress, “Countering China Economic Coercion Act,” October 15, 202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5580/text?r=21&s=1>;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trengthens Protection against Economic Coercion,” December 8,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6642](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6642).

[4] Bernhard Bartsch et al., “Deal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 as a Transatlantic Challenge,” p.24.

并提议设立 TTC。<sup>[1]</sup> 该倡议在 2021 年 6 月举行的欧美峰会上获得通过，也成为这次峰会最显著的成果之一。根据欧美官方的说法，TTC 将是欧盟与美国协调全球贸易、经济与技术问题的平台，并由 10 个专门的工作组负责落实在具体领域达成的共识，包括技术标准合作、气候变化与绿色技术、供应链安全、信息安全、数字治理、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从这些议题来看，技术是 TTC 工作的重中之重。

TTC 的成立被视为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试金石”，<sup>[2]</sup> 其首次会晤也备受关注。2021 年 9 月，TTC 首次会议在美国匹兹堡召开。欧盟与美国就加强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应对全球贸易挑战（非市场贸易行为）五个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初步共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会前表示，会议并不针对第三国，匹兹堡声明中也未直接提及中国，但在中国技术崛起的背景下，相关领域都有应对中国竞争的影子。欧洲议会最大的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EPP）在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欧美构成挑战，而 TTC 作为欧美之间的技术联盟是应对中国挑战的关键”，<sup>[3]</sup> 更直接表明了 TTC 针对中国的意图。

在与中国开展技术竞争方面，欧美协调围绕多个层面展开。一是采取所谓“小院高墙”战略，共同保护欧美技术优势，尤其是在人工智能、5G 宽带、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加大对华技术封锁力度，强化出口管制机制成为欧美协调的新重点。拜登执政后不久，其政府高级官员就表示将与盟友合作，对某些出口到中国的敏感技术采取“新的有针对性的限制”，以“防止中国增强其军事实力”。<sup>[4]</sup> 二是合作强化欧美创新能力。欧盟与美国近年

---

[1]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pp.5-7.

[2] Rebecca Arcesati and Grzegorz Stec, “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will be a Litmus Test for Transatlantic Coordination on China,” Merics, June 30, 2021, <https://merics.org/en/short-analysis/eu-us-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will-be-litmus-test-transatlantic-coordination>.

[3] EPP Group, “We Have to Renew the Technology Alliance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Face China,” September 28, 2021, <https://www.eppgroup.eu/newsroom/videos/we-have-to-renew-the-technology-alliance-between-europe-and-the-united-states-to-face-china>.

[4] “US to Look at More Restrictions on Tech Exports to China,” Reuters, February 11,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biden-trade-idUSKBN2AB075>.

来都注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并协调各自的产业政策与产业能力，保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力。三是共同设定规则与标准。技术之争也是标准和规则之争，欧美试图通过共同设定关键技术的使用规则和标准，并在这些标准中体现其价值观，维持其在技术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优势。

#### （四）欧美协调全球治理合作，应对中国的全球性影响

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已成为中美竞争与欧美协调的重要领域。拜登在202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欧洲盟友高调宣称“美国归来了”，<sup>[1]</sup>这被视为美国回归多边主义与盟友体系的重要信号，恢复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也成为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显著特征。随着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欧美学者对中国是否寻求系统性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虽然存在争议，但基本都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更积极有为，至少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sup>[2]</sup>因此，欧美协调的重点之一是应对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和进取性的态势。拜登政府已开始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一系列国际组织与协定，并与欧盟一起从内部推动国际组织改革。欧美也更加注重对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系统的投入，与中国竞争国际组织领导职位，强化其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由于“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中国推行“替代性治理模式”和在发展中国家扩展影响力的工具，美国呼吁与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盟友联合推出“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通过加强经济、技术和政治援助与中国竞争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在2021年6月的峰会上，以美欧为首的七国集团（G7）宣布推出一项全球基础设施新倡议——“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此举旨在“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高达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

---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1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2021-virtua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2] Bernhard Bartsch et al., “Deal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 as a Transatlantic Challenge,” p.30.

金缺口”。<sup>[1]</sup>虽然 G7 声明中 B3W 计划并未直接指向中国，但舆论普遍将其视为西方版本的“一带一路”方案，与“一带一路”竞争的意图明显。

在全球治理领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涉及一系列需要与中国合作的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防核扩散等。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欧美也意识到各自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维度，其对华政策协调必须置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考虑。在气候变化领域，欧美都对中国表现出合作姿态，欧美协调的重点是如何同中国一起贯彻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在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上，中美达成了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为大会的成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 二、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动因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新态势的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对欧美而言，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定义跨大西洋关系和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关键性议题。加强对华政策协调，既是出于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需要，也是为了缩小双方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巩固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维护欧美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 （一）加强竞争优势，应对中国崛起

从美国的角度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关系从乔治·沃克·布什政府至奥巴马政府开始逐步进入战略竞争时代，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得到充分体现。<sup>[2]</sup>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拜登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sup>[3]</sup>

---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2]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 期，第 104-111 页。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由此可见，竞争仍然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和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sup>[1]</sup>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欧洲盟友是美国的核心资产，在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棋盘上占据重要位置，也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获得成功的关键。美国旨在通过加强与欧盟的协调，构建应对中国崛起的联合阵线，强化其在中美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称的基于“实力地位”与中国开展竞争的题中之义。<sup>[2]</sup>

从欧盟的角度看，其同样面临与中国竞争的压力以及在中美关系中如何站位的问题。欧盟对华战略定位已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向一种包含“合作、竞争与制度性对手”的多重定位。虽然欧盟仍然将合作放在第一位，但也日益强调中欧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尤其是在冯德莱恩力图打造“地缘政治欧委会”的背景下，欧盟日益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中欧关系，将中国视为竞争者和挑战。由于此前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时常常有独自面对中国的“孤独感”。因此，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共同强化与中国竞争的优势，成为欧盟参与对华政策协调的重要动因。实际上，欧美中国问题对话机制最早也是由欧盟率先提议，是欧盟面对中美博弈的一种主动选择。博雷利在公布这一提议的记者会上曾表示，跨大西洋两岸在与中国的关系中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需要跨大西洋两岸紧密合作以共同应对。<sup>[3]</sup>

## （二）巩固欧美关系，重振跨大西洋联盟

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奉行“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政策和“蛮权力”外交，削弱了美欧之间的信任，也使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跌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

[1] 吴心伯：《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37页。

[2] Antony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3] EEAS, “Video Conference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Remarks by HR/VP Josep Borrell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June 15, 2020,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_en/80898/Video](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_en/80898/Video).

最低点。<sup>[1]</sup> 拜登当选后，欧美双方均表达了重启跨大西洋关系的强烈意愿。欧盟委员会主动出击，迅速发布《全球变局下的欧美关系新议程》，表达了主动塑造跨大西洋合作议程的愿望。该文件指出，美国政府的更迭为“构建新的跨大西洋全球合作议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sup>[2]</sup> 拜登也将重振跨大西洋联盟视为其首要任务之一。2021年2月，拜登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其发出的最明确信号是“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拜登强调，跨大西洋联盟是欧美集体安全与繁荣的基础，如果要实现21世纪的目标，欧美伙伴关系必须继续成为基石。<sup>[3]</sup>

尽管拜登的上台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重启提供了可能，但欧美都意识到跨大西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在庆祝拜登就职的演讲中，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坦率地指出，“欧盟与美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会奇迹般地消失。美国已经改变，欧洲对美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sup>[4]</sup> 拜登也表示，跨大西洋联盟的回归并非回到过去，而是共同着眼于未来。换言之，欧美寻求的不仅仅是重启或恢复跨大西洋关系，而是通过构建跨大西洋新议程，重塑跨大西洋联盟。因此，跨大西洋关系需要寻找新的契合点与合作增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成为欧美构建跨大西洋新议程、弥合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通过协调对华政策并将中国议题纳入跨大西洋关系核心议程，欧美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被特朗普政府损害的欧美关系，为重振跨大西洋联盟提供新的动力。

### （三）强化对国际规则的塑造能力，维护欧美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当今全球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这一秩序以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为基础，以美国的霸权为保障。冷战结束后，西方凭借其

---

[1] 赵晨：《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与美欧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72页。

[2]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p.1.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4] European Council, “Speech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1/20/speech-by-president-charles-michel-at-the-european-parliament-on-the-inauguration-of-the-new-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

优势地位进一步主导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并极力推崇所谓“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这一秩序虽然包含了非西方国家，但主要还是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偏好，也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保障。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秩序和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上升。另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力量削弱了西方内部的团结，也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全球秩序造成冲击，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感叹“西方霸权正在终结”。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年度报告以“西方的缺失”概括全球秩序的特征，指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非西方化……西方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不西方”。<sup>[1]</sup>这一说法也深刻地反映了欧美对国际权力转移和全球秩序变革的忧虑和不安。

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秩序和治理体系也正在发生更加深刻的调整与变革。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影响力堪比世界大战，让既有国际秩序难以为继。<sup>[2]</sup>因此，重新找回西方、重振在全球秩序中的领导权成为欧美的共同目标。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权力的转移被欧美视为其重新领导世界的主要挑战。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声称，“中国是唯一可能凭借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给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可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sup>[3]</sup>欧盟对华战略文件也认为，“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不同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奉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有选择地支持某些规范的做法削弱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可持续性。”<sup>[4]</sup>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年度报告则更直接地指出中国致力于构建一系列“平行的国际机制”，对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既是补充，

---

[1]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Westlessness,”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2020,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0/>.

[2] 袁鹏：《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第1页。

[3]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4]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p.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19JC0005>.

也是挑战。<sup>[1]</sup> 在欧美中国问题对话机制框架下，多边全球治理成为欧美协调的主要议题之一，其目的就是在多边层面联合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加强欧美对国际规则与标准的塑造能力，维护其在多边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 三、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局限

就成效而言，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趋同现象。2021年12月，在第二轮欧美中国问题对话之际，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欧将发表共同声明，以此表明美国与欧盟对华态度的“日益趋同”。<sup>[2]</sup> 这种趋同不是单纯的欧盟向美国靠拢的结果，而是欧美互相靠拢的结果。从欧盟视角看，欧盟仍然视中国为合作与谈判的伙伴，但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盟逐渐接受了美国对华政策竞争性的一面。拜登上台后，在拉拢欧洲应对中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欧盟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有更多的共识。从美国视角看，拜登政府对华定位也有向欧盟靠拢的趋势。2021年3月，布林肯上任后与博雷利进行了首次会面，其后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国与欧盟“相互理解并承认与中国的关系是多面性的，包含合作、竞争与制度性对手成分”。<sup>[3]</sup> 这表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欧盟的语言来定位与中国的关系，是欧美对华政策趋同的一种表现。尽管如此，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仍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走向和前景仍然受到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 （一）欧美对华认知分歧

虽然欧美对华共识在增强，但跨大西洋两岸对“中国挑战”的认知及应对方式上仍然存在分歧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弥合。美国作为霸权国，传统上倾

[1]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Westlessness,” p.16.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reviewing the US-EU Dialogue on China,” December 1, 2021, <https://www.state.gov/previewing-the-u-s-eu-dialogue-on-china/>.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Press Release on the Meeting between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Josep Borrell and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March 24,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by-the-secretary-of-stat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the-eu-high-representative-for-foreign-affairs-and-security-policy-vice-president-of-the-european-commission/>.

向于从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中国崛起，将中国崛起视为其地缘政治与安全挑战，对华政策的首要考量是遏制中国的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首要性，即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首要威胁”。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以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都将中国列为“首要挑战”。二是全面性。在美国看来，与中国的竞争是全面性的，涉及经贸关系、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与国际机制等。

对欧盟而言，中国既非“首要威胁”，也不是“全面竞争对手”。欧盟对华战略认知仍然是多维度和多面向的，同时视中国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sup>[1]</sup>在美国的影响下，欧盟开始逐渐重视中欧关系的安全与竞争性因素，但在其对华认知中，地缘政治与安全并非首要关切，经济利益仍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由于欧盟本身的多边主义属性以及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欧盟对华认知也深受多边主义视角的影响，即将中国视为多边国际体系以及应对全球挑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 （二）欧美对华政策分歧

美国与欧盟的对华政策分别呈现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主导的特点，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在战略竞争思维的主导下，美国政府以“全政府”方式加大对华压制，对华强硬已成为两党共识与府会共识。<sup>[2]</sup>虽然美国强调并不想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但在实践中其对华政策体现出明显的“新冷战”特征。欧盟则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中美陷入“新冷战”的局面，也不愿意彻底投身美国主导的大国竞争。<sup>[3]</sup>与其对华认知的多面性相一致，欧盟对华政策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经济上的互利合作仍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

---

[1]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p.1.

[2] 赵明昊：《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论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13-14页。

[3] Liu Zhen, “Europe doesn’t Want to See a New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SCMP, April 20,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30350/europe-doesnt-want-see-new-cold-war-between-china-and-us>.

主基调。

从根本上而言，美国与欧盟的对华政策分歧可以概括为战略性政策与战术性政策之间的分歧，这也符合美国与欧盟各自的行为体属性特征。美国对华政策体现了经典的“大战略”思维，“大国战略竞争”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范式。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领域——贸易、投资、技术、安全与人权等，都被纳入这一范式之中。欧盟虽然也视中国为“制度性竞争对手”，但全面强硬的对华政策尚未在欧盟形成普遍共识。欧盟并没有经典意义上的对华“大战略”，更多是战术性地管理中欧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对抗。正因如此，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对一致性相比，欧盟对华政策在实践中体现出矛盾性特征，往往在中欧关系的不同领域之间作出看似矛盾的决定。欧盟在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之后又对华实施人权制裁，就是这种矛盾性的直接体现。

### （三）欧盟战略自主倾向的制约

战略自主已成为欧盟主流政策话语和长远战略目标。虽然拜登执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盟的焦虑，但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没有变，欧盟也意识到美国对外政策重心将长期聚焦于“印太”地区，因此不会停下追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在拜登当选的背景下，欧盟不顾当时的美国候选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警告，宣布与中国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就被认为是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体现。<sup>[1]</sup>拜登执政后，欧盟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有所增加，但欧盟不会放弃战略自主的原则。阿富汗撤军事件以及美英澳安全联盟（AUKUS）的成立让欧盟认识到拜登政府对欧政策调整的有限性，进一步刺激了欧盟内部有关“战略自主”的讨论。<sup>[2]</sup>

在战略自主理念的影响下，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有别于过去跨大西洋关系中的“美主欧从”模式。在对华政策以及更广泛的跨大西洋政策议程上，

---

[1] Steven Erlanger, “Will the Sudden EU-China Deal Damage Relations with Biden?”

[2] Pol Morillas, “Afghanistan, AUKUS and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Joint Brief*, No.4, October 2021.

欧盟不再是任由美国设定议程的“低级伙伴”，而是相对更加平等的议程设置者之一。<sup>[1]</sup> 欧盟将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形成自己的对华政策议程，并在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协调上掌握更大的话语权。2021年2月，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盟尽管与美国价值观相近，也不应该与美国联合对付中国，因为这会适得其反。<sup>[2]</sup> 这可以视为欧盟内部在对华政策上追求“战略自主”的一种声音和体现。2021年6月，在北约峰会发表关于中国的强硬声明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北约不应忽视中国，但也不应夸大中国的威胁。中国仍然是很多议题上的合作伙伴，因此默克尔主张北约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威慑与对话的双轨模式。<sup>[3]</sup> 从欧洲领导人的涉华表态来看，欧洲在加强与美国对华政策合作的同时，也与美国“新冷战”式的对华政策保持一定距离，保留了战略自主的空间。

#### （四）“特朗普主义”遗产的制约

特朗普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政治上的党派斗争，也存在于不同的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与地域之间。特朗普执政不仅未能修正这种分化，反而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分化倾向。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但他所获得的7400万选票意味着其“群众基础”依然庞大。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美国依然拥有肥沃的土壤，其吸引力也比特朗普本人更为持久。由于特朗普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持续存在，“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将是美国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都不得不面对的沉重遗产。

“特朗普主义”的遗产将以两种方式制约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一是对内

---

[1] 严少华：《欧盟战略自主与中国对欧战略新思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30页。

[2] Rym Momtaz, “Macron: EU Shouldn’t Gang up on China with US,” Politico, February 7,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macron-eu-shouldnt-gang-up-on-china-with-u-s/>.

[3] “Merkel Wants NATO Dialogue with China,” Spiegel, June 14, 2021,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nato-gipfel-angela-merkel-will-nato-dialog-mit-china-a-9fe94bc0-c0fd-42a4-87e5-1f11c139f948>.

影响拜登政府的政策议程和优先事项。“特朗普主义”所暴露的美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将迫使拜登政府优先处理国内议题，尤其是科技、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以及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拜登也曾表示将尽力确保优先投资美国，在对国内做出重大投资之前，不会签署任何新的贸易协定。<sup>[1]</sup> 在对外政策议题上，由于美国民众对美国扮演全球领导者角色的支持度下降，拜登政府重建美国领导者角色的努力将继续受到国内民粹主义倾向的掣肘。2021年7月，拜登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其实也是遵守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撤军协议，是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延续。二是在外部影响欧盟对美国的信任。“特朗普主义”的持续影响让欧洲担心美国会再次出现特朗普似的政治人物，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冲击。2021年1月，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的事件让欧洲感到震惊，也使后者深刻意识到“特朗普主义”的持久影响力以及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的撕裂。换言之，“特朗普主义”只是美国政治与社会分化的一个缩影，并不会因为拜登的上台而销声匿迹。因此，尽管拜登宣称“美国回来了”，欧盟对拜登政府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 四、结语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加强是近年来中美欧三边关系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可能对中美欧三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协调的过程中，欧美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在双方有共识与共同利益的领域，如意识形态、供应链安全、出口管制、互联互通等，欧美开始构建针对中国的“议题联盟”，让中国在特定议题领域面临更大的压力。在美国的拉拢和影响下，欧盟对华政策导向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更可能导致欧美之间形成战术性的“议题联盟”，而非战略性的“反华联盟”。

---

[1] Thomas Friedman, “Biden: We are Going to Fight like Hell by Investing in America Firs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20,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1203/biden-interview-mcconnell-china-iran/dual/>.

这其中既有欧美之间一系列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也是由当今国际体系的特点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决定的。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经济上也与欧美市场以及整个国际体系深度融合。这些都决定了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将难以复制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沿用结盟与遏制的冷战思维对待中国不仅达不到目的，也将损害欧美自身的利益，将世界割裂为不同的集团和阵营。在2021年11月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回应了美方提出的“共存”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三点原则。<sup>[1]</sup>这三点原则为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欧美协调指明了方向。中美欧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力量，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责任重大。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应着眼于中美欧三方共处与合作，在合作中缩小分歧，而非着眼于竞争与对抗，在竞争中弱化合作。

【完稿日期：2022-1-9】

【责任编辑：肖莹莹】

---

[1] 杨依军：《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新华网，2021年11月16日，[http://www.news.cn/2021-11/16/c\\_1128068890.htm](http://www.news.cn/2021-11/16/c_1128068890.htm)。

# 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 张 蓓

〔提 要〕英国脱欧不仅是英国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也对欧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脱欧前在欧美关系中占据特殊地位，既是欧美沟通的重要桥梁，又能塑造欧盟发展方向以契合美国利益。英国脱欧深刻改变了欧盟，推动其内部力量变化和政策调整，也将改变欧美之间的互动方式，对欧美关系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百年变局下欧美关系正经历深刻调整，而英国脱欧也成为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内部变量。

〔关键词〕英国脱欧、欧美关系、欧洲一体化

〔作者简介〕张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5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2) 1 期 0085-20

近年来，欧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执政时期以“美国优先”为圭臬轻视欧美关系，拜登执政后则在大国竞争视角下力图重塑欧美关系，大变局下欧美关系前景持续引发关注。美国内政变化及其对外战略调整对欧美关系的影响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话题，但欧洲自身发展变化如何影响欧美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英国脱欧是近年来欧洲内部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分析英国脱欧如何重塑欧盟继而影响欧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英国脱欧并非重塑欧洲的唯一变量，但由于英国在欧美之间的特殊地位以及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刻冲击，使得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

响较为显著。

## 一、英国在欧美关系中的特殊性

英国脱欧之所以成为影响欧美关系的重要事件，前提在于英国在欧美关系中的特殊性。英国是欧洲大国和前世界帝国，与前殖民地美国有传统历史文化纽带。二战结束后，失去世界霸权的英国，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作为维系大国地位的关键抓手。20世纪70年代，英国加入欧共体，此后其在欧洲的影响力也与英美特殊关系互相增进，英国在欧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就此形成。这一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 （一）英美关系密切程度远超其他盟友

自1946年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讲中首提“特殊关系”以来，这一称号就成为英美关系的代名词。尽管英美各自均有重要盟友，但即便在欧美同盟内部，英美关系的密切程度也是其他欧洲国家难以企及的。

首先，英美拥有独一无二的情报与安全合作纽带。早在1946年美国就与英国签订情报合作的《美英条约》，为“五眼联盟”奠基。据西方媒体披露，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彼此重要数据库握有权限，且互不监听对方政府，这与美国长期监听法国、德国等重要盟友形成鲜明对比。<sup>[1]</sup>英国也是世界上分享美国核机密最多的国家，以1958年《美英互相防务协定》和《英美北极星军售协定》为基石，英美共建有17个联合工作小组，在涉及核武器的各领域有细致分工协同。2021年9月，美英与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开展核潜艇合作。据媒体披露，正是英国利用其在美国核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为这笔交易发挥中介作用。<sup>[2]</sup>在军事

---

[1] David Whineray, “How Transatlantic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Could Evolve After Brexit,” Carnegie Endowment, September 3, 2019,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9/03/how-transatlantic-foreign-policy-cooperation-could-evolve-after-brexit-pub-79758>.

[2] George Parker and Sabastian Payne, “AUKUS: How Transatlantic Allies Turned on Each Other over China’s Indo-Pacific Threat,”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06f95e54-732e-4508-bc92-c3752904ba67>.

交流领域，除北约框架内合作外，英美双边交流与合作也十分密切，两军定期举行联合军演，互派军官授课，英军在美国本土的各司令部均派有大量参谋人员，英国对美国军事战略制定的影响也高于美国其他任何盟友。<sup>[1]</sup>多年来，英国投入部队参与第一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海外行动，紧密跟随美国军事战略部署。

其次，英美经贸关系紧密，相互依存度高。投资是衡量两国经贸密切程度的重要指标，而英美经贸关系核心在于投资。美国为英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2019年英国吸收美国直接投资（FDI）达到3816亿英镑，占英国吸收FDI的24.5%，远超第二名荷兰的1672亿英镑。<sup>[2]</sup>英国仅次于日本，是美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19年达到5050.9亿美元，远高于加拿大、荷兰、德国等国在美投资。<sup>[3]</sup>在贸易领域，美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英国为美国第五大出口国，仅位于加拿大、墨西哥等近邻及中国之后。<sup>[4]</sup>

最后，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使英美政策趋同。依托于英美深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分别在国内外推行“撒切尔主义”改革和“里根经济学”，英美共同主张自由竞争、低税收、低监管、政府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形成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念和操作模式。<sup>[5]</sup>这一模式与主要存在于欧洲大陆国家，推崇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莱茵模式”大相径庭。<sup>[6]</sup>正是因为英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类

---

[1] 海镜：《英美特殊防务关系三大支柱》，《解放军报》2021年2月4日，第11版。

[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Statistics,” UK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December 23, 2020,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cbp-8534/>.

[3] “Countries with Highes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9,” Statista, June 24,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56713/leading-fdi-countries-usa/>.

[4] “Trade and Investment Core Statistics Book,”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pril 20, 202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8496/Trade-and-Investment-Core-Statistics-Book-2021-04-20.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8496/Trade-and-Investment-Core-Statistics-Book-2021-04-20.pdf).

[5] Christopher J. Nock and Catherine Coron, “Post-Crisis Anglo-Saxon Capitalism,” *Literature, History of Ideas, Images and Societie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No. 2, 2015.

[6] 丁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法和英、美经济表现和成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4期，第41页。

似，两国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看法相近，英美得以在竞争政策、国家补贴、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上观念趋同，而与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有显著区别。

## （二）英国脱欧前在欧盟有较大影响力

英国在欧盟内素有“不情愿的欧洲人”“尴尬的伙伴”之称，在货币联盟、申根区、司法、内政等领域都获得诸多“例外权”，但这与英国在欧盟强大的影响力和政策塑造力并不矛盾。有研究表明，1996—2008年，在经济、安全等核心政策上英国国内偏好与欧盟政策走向有极高重合度，表明英国塑造欧盟政策的能力较强。<sup>[1]</sup>英国的影响力来源于诸多客观因素。根据2016年数据，英国占欧盟总人口的12.8%，<sup>[2]</sup>经济总量的16%，<sup>[3]</sup>防务支出的27%，<sup>[4]</sup>这赋予了英国对欧盟决策的较大话语权。同样重要的是，英国代表欧盟内部发展方向争论中的重要一派，并积极利用自身影响力塑造欧盟政策走向，是诸多欧盟小国在欧盟政策塑造上倚赖的“非正式领导”。

撒切尔时代以来，历届英国政府对欧盟发展方向均保持较为一致的看法。英国主张欧洲一体化以政府间的合作方式开展，对联邦主义倾向深怀警惕；主张深化欧盟内部自由贸易区，降低政府干预，减小欧盟保护主义倾向；主张欧洲防务以支持北约、为美国分担责任为目标等。<sup>[5]</sup>历届英国政府均以此为原则塑造欧盟政策，在欧盟经济、外交与防务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烙印。

在经济领域，英国在欧盟内积极推动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深化单一市场

---

[1] Anand Menon and John-Paul Salter, “Britain’s Influence in the EU,”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Vol.236, May 2016, pp.7-13.

[2] “EU Population up to Slightly over 510 Million at 1 January 2016,” Eurostat, July 8, 2016,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7553787/3-08072016-AP-EN.pdf/c4374d2a-622f-4770-a287-10a09b3001b6#:~:text=On%201%20January%202016%2C%20the,million%20on%201%20January%202015.>

[3] “Share of Member States in EU GDP,” Eurostat, April 10, 2017,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DDN-20170410-1.>

[4] “How Much is Spent on Defence in the EU?,” Eurostat, June 7, 2017,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EDN-20170607-1.>

[5] Margaret Thatcher, “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Thatcher Archive, September 20, 1988,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7332.>

建设。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指派前内阁大臣科克菲尔德担任欧委会单一市场委员。1985年科克菲尔德撰写了著名的《完善内部市场》白皮书，提出近300项措施，为建立真正的内部大市场制定了明确路线图。撒切尔本人也在《单一欧洲文件》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sup>撒切尔之后的英国政府也常与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共同倡导欧盟经济自由主义方向，完善单一市场。<sup>[2]</sup>2014年英国还成功争取到欧盟金融稳定和监管委员这一重要职位，以推动欧洲资本市场自由化。<sup>[3]</sup>

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英国也有极大的塑造力。20世纪90年代，欧盟内部在东扩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相对于德法的谨慎态度，英国积极支持东扩，最终在1998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东扩进程正式开启。<sup>[4]</sup>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上，英国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科索沃危机爆发后，英国决心投入欧洲防务建设。1998年12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圣马洛宣言》，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奠定基础。但此后由于英国担心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会威胁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又多次否决相关合作倡议，致使欧盟防务合作多年来未能取得有效进展。

### （三）英国在调解欧美分歧上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由于英美在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英国在欧盟推动的政策往往符合美国

---

[1] Helene Von Bismarck, "Margaret Thatcher: the Critical Archite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May 4, 2016, <https://ukandeu.ac.uk/margaret-thatcher-the-critical-architect-of-european-integration/>.

[2] David Henig, "Sweden, UK and the EU: Managing Post-Brexit Relations and Defining a New Agenda for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27, 2019, [https://ecip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ECI\\_18\\_UK-TradePolicy\\_1-2019\\_LY03.pdf](https://ecip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ECI_18_UK-TradePolicy_1-2019_LY03.pdf).

[3] Bruno Waterfield, "Lord Hill Wins Financial Services Post in New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Telegraph, September 9, 2014,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eu/11086631/Lord-Hill-wins-financial-services-post-in-new-European-Commission.html>.

[4] Charles Grant, "Europe's Blurred Boundaries,"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October 2, 2006,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1/p\\_696\\_boundaries\\_grant\\_29-881.pdf](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pdf/2011/p_696_boundaries_grant_29-881.pdf).

偏好。在军费问题上，英国是为数不多的军费开支占GDP比例达到2%的欧洲国家，在美国的欧洲盟友中发挥了表率作用，英国也在其主办的2014年北约峰会上推动设立了10年内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开支逐步增加至占GDP2%的“北约标准”。在欧洲防务问题上，美国对欧盟的军事一体化倡议心怀戒备，而英国也认同北约作为欧洲安全的首要提供者，多次阻挠欧盟构建欧洲安全和防务认同的努力，维护了美国关切。

在经贸问题上，英国与欧盟虽然在空客补贴、欧盟香蕉进口等欧美分歧问题上立场一致，但英国支持的争端解决方式对美国有利。英美也联手阻碍了欧委会推进“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这一监管机制。<sup>[1]</sup>奥巴马执政期间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英国在欧盟内部积极游说，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sup>[2]</sup>

此外，英国能协调欧美立场，推动欧美在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选择与美国并肩作战，避免欧盟形成共同反对美国的立场。<sup>[3]</sup>“9·11”事件之后，英国斡旋欧洲国家启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首相布朗在欧洲各国进行穿梭外交，推动欧洲国家与美国在2009年G20峰会上达成一致的财政刺激方案。<sup>[4]</sup>

以上回顾表明，英国在脱欧前能有效帮助欧美沟通，并确保欧盟政策发展不与美国利益冲突。从肯尼迪到奥巴马，美国一直支持甚至要求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就是因为英国在欧盟内能够照顾美国关切、维护欧美关系。

---

[1] Michael Calingaer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Economic and Business Aspects: American Perspective,” *Europe: Financial Crisis and Security Issues*, 2006, p.199.

[2] David Henig, “Sweden, UK and the EU: Managing Post-Brexit Relations and Defining a New Agenda for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3] Tomas Valasek, “Europe in the US-UK Special Relationship,”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August 2, 2007, <https://www.cer.eu/insights/europe-us-uk-special-relationship>.

[4] Philip Gannon, “The Bridge that Blair Built: David Cameron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British Politics*, No.2, 2014, pp.210-229.

## 二、英国脱欧推动欧盟重塑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作出脱欧这一历史性决定，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退出欧盟。英国脱欧既是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的结果，也是欧盟多重危机“后遗症”的产物，<sup>[1]</sup>是内因与外因、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脱欧极大地影响了欧盟，笃信欧洲“日益紧密的联盟”的欧盟执政精英受到巨大心理冲击，而欧盟的未来发展也将由于失去英国的贡献和参与而与过去大不相同。总的来看，英国脱欧主要在以下三方面推动了欧盟重塑：

### （一）欧盟内部力量结构发生改变

从人口、经济 and 影响力等诸多指标看，英国都是欧洲大国，在欧盟决策中有重要发言权，在欧盟内外政策上代表鲜明立场，是欧盟内部多个非正式联盟的“领导者”。英国脱欧打破了欧盟原有的力量格局。

一是欧盟内部“大西洋主义”力量被削弱。欧盟内部一直存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分野，前者支持欧美合作的跨大西洋联盟，而后者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欧洲前途所在，“戴高乐主义”即为“欧洲主义”的形式之一。尽管两种政策路线并不截然对立，且不同程度存在于每个欧盟国家，但欧盟各国仍有“大西洋主义”国家与“欧洲主义”国家的区别。前者典型代表包括英国、丹麦以及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等2004年后新入盟的国家，而“欧洲主义”国家典型代表为法国，德国虽有浓厚“大西洋主义”传统，却也是“欧洲主义”的扛旗者。“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国家有明显政策分歧。如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伊拉克战争时期，15个欧盟国家中只有8个支持美国，德法则提出不同于美国的“欧洲立场”；在经贸政策上，“大西洋主义”国家也对欧美TTIP更为支持。<sup>[2]</sup>英国是欧盟内“大西洋主义”最深厚的国家，戴高乐就曾以此为由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同时英国也

[1] 金玲：《英国脱欧：原因、影响及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24页。

[2] Aleksandra Sojka, Jorge Díaz-Lanchas and Federico Steinberg, “The Politicization of Transatlantic Trade in Europe: Explaining Inconsistent Preferences Regarding Free Trade and the TTIP,”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https://ec.europa.eu/jrc/sites/jrcsh/files/jrc117871.pdf>.

是其他“大西洋主义”国家的重要盟友与伙伴。英国脱欧大大削弱了欧盟内“大西洋主义”一派的力量。

二是欧盟内经济自由主义力量下降。欧盟内部存在经济自由主义派和保护主义派，前者主张市场开放、反对过度监管，以德国、英国、荷兰、丹麦等国家为代表；后者对市场采取保护态度，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为代表。英国脱欧使经济自由主义国家人口占比从35%缩小到26%，使其失去了在理事会“有效多数投票机制”中所需的35%人口门槛，而“地中海俱乐部”国家（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人口占比从25%增加到了44%，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人口占比就从34%增加到了39%，可以更灵活地在理事会投票中构建联盟，使得倾向于经济干预主义、积极产业政策的国家对欧盟政策的塑造力加大。<sup>[1]</sup>尽管欧盟其他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对此有所反应，如组建“汉萨联盟”<sup>[2]</sup>“节俭四国”<sup>[3]</sup>等新的非正式联盟，荷兰也表示要做欧盟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的召集者，实际上这些国家的GDP只占欧盟五分之一，难以弥补英国离去的影响。<sup>[4]</sup>

三是法国与德国在欧盟影响力进一步强化。法德合作是欧洲一体化的肇始，两国的联合领导也为欧洲一体化提供持久动力。<sup>[5]</sup>但20世纪70年代英国加入欧共体后有力地平衡了“法德轴心”，避免法德过度主导欧盟发展方向，成为其他欧盟小国在欧盟政策制定中依赖的重要盟友。<sup>[6]</sup>英国脱欧公投

---

[1] Ulrich Krotz and Joachim Schild, “Back to the Future? Franco-German Bilateralism in Europe’s Post-Brexit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5, No.8, 2018, pp.1174-1193.

[2] Daniel F. Schulz and Thomas Henökl, “New Alliances in Post-Brexit Europe: Does the New Hanseatic League Revive Nordic Political Cooperation?,”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8, No. 4, 2020, pp.78-88.

[3] Pepijn Bergsen, “The Frugal Four exhibit a British attitud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LSE Blog, June 23, 2020, <https://blogs.lse.ac.uk/brexit/2020/06/23/the-frugal-four-exhibit-a-british-attitude-to-european-integration/>.

[4] “A Daunting Task for the EU’s Economic Liberals,” *Financial Times*, April 12,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f30fadea-3d79-11e8-b7e0-52972418fec4>.

[5] Emmanuel Mourlon-Druol, “Rethinking Franco-German Relat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ruegel, November 2017, <https://www.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PC-29-2017.pdf>.

[6] Charles P. Ries, “Will Brexit Change the European Union?,”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2,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brexit-change-european-union-165959>.

后，英国影响力急剧下降，意大利、波兰等潜在大国各有内部问题，难以取代英国地位，法德影响力增强，特别是2017年马克龙当选、默克尔连任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尽管法德力量不对称，在欧盟改革问题上也有分歧，但近年来，在英欧谈判、产业政策倡议、新冠疫情复苏基金等问题上，“法德轴心”已成为欧盟维护团结、应对危机、驱动议程的关键力量。此外，在欧洲外交、安全与防务等领域，法德维护欧洲战略利益的立场也逐步走近。2019年1月法德签署《亚琛条约》深化两国外交、防务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并共同发布非正式文件，呼吁举办“欧洲未来大会”，讨论如何让欧盟在一系列挑战中“更团结、更主权”。

英国脱欧给欧盟内部力量结构带来的变化，即“欧洲主义”势力上升、经济自由主义力量被削弱、“法德轴心”增强，均在欧盟经济治理及外交安全政策的调整中有所体现，预示着一个经济上更趋向保护主义、战略上自主性更强的欧盟。

## （二）欧盟经济政策更趋向干预与保护

英国脱欧是欧盟成员国疑欧主义的重大突破，也是欧洲一体化的首次倒退，因此欧盟将此视为“生存危机”。<sup>[1]</sup>在深重的危机感下，欧盟对英国脱欧根源以及欧洲一体化未来方向进行了规模较大、程度较深的反思。<sup>[2]</sup>总的来看，欧盟将英国脱欧归因于反全球化力量、将欧盟责任归结为对全球化负面效应应对不力。英国脱欧公投后，欧盟各国政要发表的评论均指向此处。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柯斯塔称欧盟没能监管全球化，是欧盟最大的失败。意大利前总理恩里克·莱塔、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延斯·魏德曼都称欧盟已成

---

[1] “State of the Union 2016,” European Commission, September 14, 2016, [https://ec.europa.eu/info/priorities/state-union-speeches/state-union-2016\\_en](https://ec.europa.eu/info/priorities/state-union-speeches/state-union-2016_en).

[2] 这些活动包括2016年6月的欧盟27国非正式会议、2016年9月的布拉提斯拉发峰会并发布《布拉提斯拉发路线图》、2017年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的罗马峰会等。欧盟委员会也出台一系列报告，旨在开启内部辩论，包括2017年3月欧委会发布的《关于欧洲未来的白皮书》，被视为设计脱欧后的欧盟未来的重要头脑风暴，此外还有2017年5月和6月发布的《关于增强欧洲社会层面的反思文件》《增强全球化反思文件》《关于深化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反思文件》《欧洲防务未来的反思文件》《欧洲财政未来的反思文件》等。

为全球化的“特洛伊木马”。<sup>[1]</sup> 欧盟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发布的《增强全球化反思文件》等文件中表示，欧盟需要对症下药，改善经济治理方式，在全球化浪潮中更好保护欧洲民众和欧盟利益。<sup>[2]</sup>

欧盟对英国脱欧的反思结果是，欧盟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欧洲一体化成果和欧洲制度吸引力，需要更有力地保护其经济治理模式，维护其在全球化中的利益。这一认识增强了欧盟调整经济治理模式的理论依据，此后欧盟采取了诸多措施推进这一目标。

从内部经济治理看，欧盟采取了保护主义色彩更浓、干预性更强的做法。近年来，欧盟先后推出《产业政策》《绿色新政》，意图以绿色和数字为抓手，维护欧盟产业竞争力。欧盟升级了包括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在内的贸易防御规则，使欧盟能对倾销产品征收更高关税。<sup>[3]</sup> 欧盟建立了外商投资审查体系，加强对欧洲战略资产的保护。在数字及下一代技术领域，欧盟也综合运用一系列手段，加大政府干预力度，为欧洲企业争取成长空间。如欧盟推出《数字市场法案》《数字服务法案》，对谷歌等企业开出天价罚单，以公平竞争为名保护欧洲企业，批准了电池等领域的“欧洲共同利益重要计划”。欧盟还提出碳边境税等政策，以阻止环保标准较低国家的企业获得对欧盟企业的竞争优势。<sup>[4]</sup>

在外部，欧盟开展更为积极的经济外交，意欲推动全球化经贸规则重塑以维护欧洲经济模式。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欧盟更加强调“公平竞争”（level playing field），要求“对等”。欧盟借助其作为世界最大贸易集团的地位，提出要在数字、贸易等领域更新国际规则，填补规则漏洞。

---

[1] Eszter Zalan, “EU Must Protect its Citizens,” Euobserver, August 2, 2016, <https://euobserver.com/institutional/134546>.

[2] “Reflection Paper on Harnessing Globaliz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May 17, 2017,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reflection-paper-harnessing-globalisation\\_en](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reflection-paper-harnessing-globalisation_en).

[3] Guillaume Van der Loo and Michael Hahn, “EU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since the Treaty of Lisbon,”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October 11, 2020, <https://www.ceps.eu/ceps-publications/eu-trade-and-investment-policy-since-the-treaty-of-lisbon/>.

[4] Kate Abnett, “EU Considers Tax, Emissions Trading for Carbon Border Plan,” Reuters, July 23,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limate-change-eu-carbon/eu-considers-tax-emissions-trading-for-carbon-border-plan-idUSKCN240IIM>.

此外，欧盟继续拓展对外贸易模式，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推广自身标准。<sup>[1]</sup> 欧盟加快了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署进程，与日本、越南、新加坡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达成了自贸协定，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等国开启谈判，与墨西哥更新了协议，与中国完成了投资协定谈判。

### （三）欧盟防务一体化取得进展

英国脱欧对欧盟安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欧盟整体防务能力因英国脱欧受损。英国是欧洲传统军事强国和核武器国家，与法国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接近全谱系军事力量的国家，在情报、反恐、冲突预防等领域资源丰富，脱欧前英国国防开支约占欧盟28国的四分之一，军队人数占十分之一。<sup>[2]</sup> 英国的军事资源是欧盟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依托，如英国参加了马里军事能力训练任务和索马里军事训练任务等多项欧盟军事行动，担任欧盟在非洲之角“亚特兰大行动”的总指挥。

但更重要的是，英国脱欧对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产生了直接刺激。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外部安全形势恶化，特朗普执政后对北约及欧洲安全承诺松动，这些因素迫使欧盟重新思考其安全政策。2016年6月发布的《欧盟全球战略》首提战略自主，称“合适程度的雄心和战略自主对欧盟在其边境内外提升和平与安全很重要”。英国脱欧为欧盟重新激活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解除了一大障碍，欧盟向战略自主迈出重要一步。

尽管不同欧盟成员国对战略自主的理解仍有差别，但从安全和防务领域看，基本共识是指在美国不在场的情况下欧盟“在必要时拥有自主行动的能力”。<sup>[3]</sup> 由于英国长期将欧洲防务与跨大西洋关系视为零和博弈，一直限制CSDP发挥作用，不仅阻碍CSDP自主执行军事行动，<sup>[4]</sup> 也反对提高欧洲防务机构

---

[1] Ferdi De Ville and Gabriel Siles-Brügge,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EU Trade Policy,”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7, No. 3, 2019, pp. 7-18.

[2] Sven Biscop, “Brexit, Strategy and the EU: Britain takes leave,” Egmont, January 31, 2018, <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brexit-strategy-and-the-eu-britain-takes-leave/>.

[3] Sven Biscop,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the Right Level of Ambition,” *Encompass*, September, 2016, <https://encompass-europe.com/comment/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the-right-level-of-ambition>.

[4] Sven Biscop, “The UK and European Defence: Leading or Leav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6, 2012, pp.1297-1313.

的预算。<sup>[1]</sup>

英国脱欧后，欧盟防务一体化开始加速。2016年9月，英国脱欧公投后欧盟第一次非正式峰会深入讨论“组建永久性欧盟军事指挥部”等防务一体化路线图问题，呼吁成立“欧洲防务联盟”，组建欧盟联合军队和欧盟军事司令部等。2017年12月，欧盟25个成员国签署联合协议，建立“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PESCO）框架，鼓励各成员国发展共同防务能力。欧盟委员会成立了欧洲防务基金（EDF），欧盟2021年至2027年多年期财政框架为EDF拨款70亿欧元以资助共同研究和采购计划，设置了防务产业和空间总司监管防务产业行动。2017年欧盟发起“年度协同防务评估”（CARD），以协调成员国防务投资填补欧洲军事能力缺陷。欧盟还投资了15亿欧元提升军事机动性，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让欧盟军队可以快速过境。此外，成员国也在就欧洲和平机制（EPF）进行磋商，该机制将帮助成员国采取共同行动，使欧盟能为外国军队提供武器。<sup>[2]</sup>

除能力建设之外，欧洲国家也在集体部署和战略文化上作出努力。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了“欧洲干预倡议”，目的是推动形成欧洲共同战略观，提高欧洲国家通过北约、欧盟及“意愿联盟”等形式联合部署的能力。2020年下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欧盟发起“战略指南针”项目，目标是对欧盟威胁和回应方式形成共同认知，预计在2022年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公布。“战略指南针”有望为欧盟未来行动提供切实的战略指引，为欧盟防务合作提供更为清晰的政治指引。<sup>[3]</sup>

尽管欧盟防务领域战略自主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不能否认英国脱欧后欧盟已取得CARD、EDF、PESCO等具体进展，这些机制若能被充分利用，将成为

---

[1] Ulrich Krotz and Joachim Schild, “Back to the Future? Franco-German Bilateralism in Europe’s Post-Brexit Union”.

[2] Sophia Besch and Luigi Scazzieri,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December 11, 2020,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20/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and-new-transatlantic-bargain>.

[3] Niklas Nováky, “The Strategic Compass Charting a New Course for the EU’s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Wilfried Marten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December 2020, [https://www.martenscentre.eu/wp-content/uploads/2020/12/CES\\_POLICY-BRIEF\\_TheStrategicCompass-V1.pdf](https://www.martenscentre.eu/wp-content/uploads/2020/12/CES_POLICY-BRIEF_TheStrategicCompass-V1.pdf).

欧盟国家集体发展能力的平台，也是欧盟向战略自主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 三、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挑战

由于英国在欧美之间长期发挥特殊作用，英国脱欧将显著影响欧美传统互动方式；英国脱欧是欧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欧盟在此刺激下作出了巨大政策调整，其影响也将外溢至欧美的合作与协调。总的来看，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 （一）欧美经贸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英国脱欧推动欧盟以保护主义色彩更浓、干预性更强的方式抵御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这与美国的转变类似，美国人在全球化中的“被剥夺感”是特朗普胜选的重要推动力。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经贸政策也大兴保护主义，攻击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拜登政府也难改“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底色，<sup>[1]</sup>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理念，显著调低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多次强调要弥补美国工人，推进“买美国货”新政。内部趋保护、外部趋强势的欧盟，<sup>[2]</sup>与“经济民族主义”美国对撞明显，欧美在经贸领域竞争和冲突面上升，为其经贸政策协调制造更多障碍。

从内部摩擦上看，欧美在农产品、空客/波音补贴案等问题上的传统分歧仍复杂难解。特朗普执政期间将欧盟视为“敌手”，称“欧盟的组建就是为了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与欧盟展开针锋相对的关税战。拜登上台后虽有意缓解与欧盟的经贸冲突，如在2021年6月的欧盟—美国峰会上同意暂停5年实施波音—空客争端关税、在2021年10月的G20峰会期间就钢铝关税达成协议，但均因国内利益集团阻力，仅达成“休战”而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欧美传统经贸摩擦的核心在于双方在政府补贴、监管标准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欧美保护主义同时上升更不利于双方化解矛盾。

---

[1] James Traub, “Biden Is Getting Ready to Bury Neoliberalism,” *Foreign Policy*, August 27,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8/27/biden-is-getting-ready-to-bury-neoliberalism/>.

[2] 金玲：《欧美关系重塑：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49页。

此外，欧盟在经济治理领域采取新的干预与保护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欧美抵牾。近年来，欧盟的产业政策、法德推动的欧洲“冠军产业”倡议均引起美国的疑虑和不满。<sup>[1]</sup>在数字领域，欧盟在隐私保护、市场监管等领域加强了立法和行政手段，美国科技巨头受到较大影响，美国认为欧盟有意打击其互联网商业模式。<sup>[2]</sup>特朗普执政期间，美欧在数字领域已有多次交锋，拜登执政后欧美气氛有所缓和，但欧洲对在数字时代日益沦为美国科技巨头“数据殖民地”、丧失自身竞争力的忧虑恐难消除，欧美仍将在数字税、隐私权等问题上继续博弈。<sup>[3]</sup>

上述分歧均为欧美联手“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制造了障碍。欧美都在不同场合表示，希望采取措施“更新国际经贸规则”，以“纠正中国不公平经贸行为”，限制中国在数字、科技、绿色经济等新领域获得更大规则制定权。特朗普执政时期主要采取单边做法，而拜登就任后欧美已达成原则性共识，要携手推动全球经贸规则重塑。<sup>[4]</sup>然而，欧美在经济治理上的分歧和矛盾为二者联手制造了障碍。如法德共同推动欧洲产业战略，加剧了欧盟与美日在WTO产业补贴规则上的讨论难度，美欧日三边讨论也因此一度停滞。<sup>[5]</sup>欧美钢铝争端也影响了其利用WTO补贴规则施压其他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sup>[6]</sup>欧

---

[1] Adam S. Posen, “Rebuilding the Global Econom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bruary 2021,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iie-briefings/rebuilding-global-economy>.

[2] Kati Suominen, “On the Rise: Europe’s Competition Policy Challenges to Technology Compani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ise-europes-competition-policy-challenges-technology-companies>.

[3] Tara Varma and Jeremy Shapiro, “The European Offers America Cannot Refuse,” War on Rocks, November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11/the-european-offers-america-cannot-refuse/>.

[4] Mark Linscott, “For WTO Reform, Most Roads Lead to China. But Do the Solutions Lead away?,” Atlantic Council, March 17,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for-wto-reform-most-roads-lead-to-china-but-do-the-solutions-lead-away/>.

[5]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Reform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ospects for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and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Chatham House, September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09/reforming-world-trade-organization/07-challenges-transatlantic-partnership>.

[6] Adam S. Posen, “Rebuilding the Global Economy”.

盟坚持“监管超级大国”的定位也影响其与美国在绿色经济、科技、数字等领域的监管标准合作，限制二者联手推动国际标准制定。因此，尽管欧美有心共同重塑经贸规则，但双方经贸合作现状使联手说易行难。

此外，欧盟也不愿被动等待美国的合作倡议，仍将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贸博弈和规则塑造。2020年底，在拜登团队已明确表示反对中欧投资协定、要与欧盟一起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背景下，欧盟仍与中国如期完成投资协定谈判，表明了欧盟态度。

## （二）欧美安全关系内部挑战增多

欧美关系的核心纽带是以北约为基础的的安全关系。近年来，尽管北约在行动层面依旧活跃，但内在张力已持续显现。美国历届政府对欧洲责任分担的不满演变成特朗普任内对北约的大肆抨击。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松动的怀疑促使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北约“脑死亡”。在这一背景下，英国这一欧洲安全大国脱离欧盟轨道，而欧盟借此机会以战略自主为目标提升欧盟防务建设，也将加大欧美安全关系业已存在的内部挑战。

英国脱欧首先加剧了北约内部欧美能力与资源的不对称。英国脱欧后，非欧盟的北约成员承担北约80%的军费，<sup>[1]</sup>仅有唯一一个欧盟成员国指挥北约营，这使得非欧盟的成员国在北约军事指挥上占据绝对优势。<sup>[2]</sup>英国脱欧也使北约与欧盟关系更趋复杂。尽管冷战时期欧盟与北约分工明确，但随着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逐渐成型，北约与欧盟开始出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关系。<sup>[3]</sup>

英国曾是北约与欧盟进行有效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欧盟与北约在国际事务中的同步协调，如2018年4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北约框架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欧盟对此背书，英国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英国脱欧使欧

---

[1] Naz Gocek, “Brexit Impact on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NATO, April 8, 2019, <https://natoassociation.ca/brexit-impact-on-nato-and-european-security/>.

[2] Jamie Shea, “European Defence After Brexit: A Plus or a Minus?,” *European View*, Vol.19, No.1, 2020, pp. 88-94.

[3] Robert E. Hunter,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NATO’s Companion or Competitor?,” RAND Corporation, 2002, [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463.html](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463.html).

盟与北约在成员上失去了一重大联结，欧盟与北约协调能力将受到削弱，也将加大未来欧盟与北约的合作难度。<sup>[1]</sup>此外，英国脱欧也使“欧盟安全”与“欧洲安全”的分野更加明显。北约现阶段仍是欧洲安全的核心，但英国脱欧后欧盟“两边下注”的趋势较为明显，在号召加强与北约合作的同时也加大了防务一体化建设，<sup>[2]</sup>而欧盟战略自主的呼声在阿富汗撤军以及AUKUS协议公布后进一步上升。<sup>[3]</sup>

这将加大欧美安全关系的内在挑战。美国虽希望欧盟国家提升防务能力，承担安全责任，但一直将欧盟防务和北约视为零和博弈，对欧盟防务合作深怀戒心。<sup>[4]</sup>美国不希望欧盟防务与北约已有机制重叠，抢夺北约资源，反对欧盟以防务合作为名保护欧洲军工产业，为美国出口制造障碍，也不会接受美国的联盟领导力受削弱。<sup>[5]</sup>这些内部矛盾在特朗普时期表现得较为显著。2019年5月，美国国防部助理防长在给欧盟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的信中将欧盟防务称为跨大西洋关系的“毒药”。<sup>[6]</sup>

拜登执政后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对欧盟防务的表态，为平复欧盟对AUKUS不满，拜登甚至口头表示“认可欧盟防务的重要性”，<sup>[7]</sup>同意召开欧

---

[1] Nele Marianne Ewers-Peters, “Brexit’s Implications for EU-NATO Cooperation: Transatlantic Bridge No Mor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3, No.4, 2020, pp. 576–592.

[2] Maria Eleni Kopp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DP and NATO after Brexit and the EU Global Strategy,”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Progressive Studies, April 2019, [https://www.feps-europe.eu/attachments/content/relationship\\_cspd\\_nato\\_after\\_brexit.pdf](https://www.feps-europe.eu/attachments/content/relationship_cspd_nato_after_brexit.pdf).

[3] Zachary Paikin, “AUKUS and the Strategic Compass Towards a European ‘Third way’ in the Indo-Pacific?,”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December 2, 2021, <https://www.ceps.eu/aukus-and-the-strategic-compass/>.

[4] Sven Biscop,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Not Without the European Unio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2020, pp. 81-94.

[5] Sven Biscop, “Come on, Biden, Let’s Talk!,” Egmont Institute, October 13, 2021 <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40384-2/>.

[6] Guy Chazan and Michael Peel, “US Warns Against European Joint Military Project,” *Financial Times*, May 15,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d16ce08-763b-11e9-bbad-7c18c0ea0201>.

[7] Daniel Kochis, “Did Joe Biden Just Give a Green Light to an EU Arm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27, 2021,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commentary/did-joe-biden-just-give-green-light-eu-army>.

盟—美国安全与防务对话，但美欧安全关系的内在挑战恐难轻易消除。小布什等美国总统也曾对欧盟防务有支持性表态，但在行动中仍然加以反对。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提出的欧盟和北约防务分工的“不脱离”“不重叠”“不歧视”的“3D”原则仍是美国军政各界主流观点。2021年9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再度警告欧盟防务不能与北约重叠。<sup>[1]</sup>更重要的是，在大国竞争时代，北约在欧洲安全的主导地位将是美国争取欧洲配合其全球战略的最关键筹码。<sup>[2]</sup>美国维护北约在欧洲安全的主导地位是为了维持对欧洲的领导力与控制力，而欧盟推动防务一体化则是为了追求战略自主，二者存在深刻矛盾。

### （三）客观上要求美国加大对欧洲盟友体系的投入

对于美国来说，欧美关系的本质是管理和维护其欧洲盟友体系，包括军事合作、成本分摊、调解盟友内部矛盾等事务，更重要的是要促使盟友在大多数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与美国保持政策一致，配合美国国际战略。<sup>[3]</sup>管理盟友体系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重要命题和难题，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也是如此。

拜登政府将盟友体系视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提出“更新盟友体系”“同盟体系现代化”等目标。欧洲是拜登政府最看重的盟友，美国要求欧洲在经贸、科技、对华政策等问题上与美协调一致，以“增强西方整体对华竞争的战略地位”，<sup>[4]</sup>这就给美国管理欧洲盟友体系设定了更高目标。<sup>[5]</sup>

---

[1] Jacopo Barigazzi, “Stoltenberg: European Allies were Consulted over Afghanistan,” Politico Europe, September 11,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fghanistan-europe-nato-stoltenberg-allies-consulted/>.

[2] Stephen M. Walt, “Exactly How Helpless Is Europe?,” Foreign Policy, May 2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21/exactly-how-helpless-is-europe/>.

[3] 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0-106页。

[4] A Wess Mitchell, “Biden Team’s Embrace of Europe Falls Short on Content,” 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biden-blinken-europe-trans-atlantic-alliance-nato-china-russia-strategy/>.

[5] Katrina Mulligan, Jordan Link and Laura Edwards, “The Road to a Successful China Policy Runs Through Europe,” War on Rocks, December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11/the-road-to-a-successful-china-policy-runs-through-europe/>.

英国脱欧对此提出了新的挑战。英国曾为美国管理欧洲盟友体系提供了最多帮助。脱欧前英国利用其在欧盟内的有利地位，向美国解释欧盟复杂的运作体系，识别欧盟内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政策，在欧盟内召集支持美国的力量，阻止美国反对的政策。尽管美国与欧盟及欧洲各国均有畅通对话与合作渠道，但英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美国在欧盟最信赖和最有效的支持者。

但脱欧使英国失去正式的欧盟决策权，且因其选择“硬脱欧”模式，也不愿在外交、安全事务上与欧盟建立机制化联系，限制其从外部对欧盟发挥影响力的空间。<sup>[1]</sup>此外，英国脱欧也使英欧关系严重受损，脱欧谈判四年中双方多次互相攻讦，极大损耗了好感与信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英欧展开疫苗争夺战，继续在脱欧协议执行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还在2021年6月的G7峰会上公开不和。英国在欧盟影响力的急剧萎缩不仅连带使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受损，英欧因脱欧产生的矛盾与敌意也给美国整合欧洲盟友制造新的麻烦。从欧盟的角度看，英国脱欧后欧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将要求欧美之间形成更平衡和对称的伙伴关系。<sup>[2]</sup>但是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无疑提高了美国管理欧洲盟友体系的成本。

美国战略界较早就意识到英国脱欧将给美国管理跨大西洋联盟带来挑战。公投前后就有多位美国政要以各种方式表示英国脱欧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挑战。<sup>[3]</sup>2019年、2020年美国国会还因北爱尔兰边境问题就英欧谈判公开表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英美双边关系与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对美国价值几乎等量，因此英国脱欧对美国高度不利。<sup>[4]</sup>美国布鲁

---

[1] Alice Billon-Galland and Richard G. Whitman, “Towards a Strategic Agenda for the E3,” Chatham House, April 2021,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4/towards-strategic-agenda-e3>.

[2] A Wess Mitchell, “Biden Team’s Embrace of Europe Falls Short on Content,” 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biden-blinken-europe-trans-atlantic-alliance-nato-china-russia-strategy/>.

[3] Katrina Mulligan, Jordan Link and Laura Edwards, “The Road to a Successful China Policy Runs Through Europe”.

[4] Alice Billon-Galland and Richard G. Whitman, “Towards a Strategic Agenda for the E3”.

金斯学会学者托马斯·莱特也认为英国脱欧的结果对美国有战略性意义，美国绝不能接受英国在恶化英欧关系的情况下脱欧。<sup>[1]</sup>

为弥补英国脱欧给美国管理欧洲盟友体系带来的损失，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欧洲盟友体系的投入，调整其管理欧洲盟友体系的姿态。首先，美国将不得不卷入欧洲内部事务，出手调解英欧矛盾，避免英欧分歧加剧。2021年6月，英欧再次因为脱欧协议执行问题争执不下，拜登政府出面干预，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避免英欧矛盾升级。<sup>[2]</sup>其次，为填补美国因英国离去而损失的欧盟影响力，美国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与欧盟机构以及各成员国接触。近年来，美国显著增强与法德的对话，加强与波罗的海国家、中东欧国家等欧盟内部区域的联系，以获取欧盟信息、塑造对美国有利的欧盟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国这一重要的欧洲科技、经济大国游离在欧盟框架之外，而拜登政府试图整合跨大西洋联盟在经济、科技领域的资源，以配合其大国竞争战略，已有美国智囊建议美国政府构建新的欧美对话与合作机制，将英国囊括在内，与欧洲盟友实现有效的多领域协调。<sup>[3]</sup>

总的来看，英国脱欧给欧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客观上要求美国加大对欧洲盟友体系的投入，以维护美国在欧美关系中的领导地位。基辛格就认为英国脱欧后“欧美关系需要适应全新的世界”，<sup>[4]</sup>美国应该将英国脱欧这一“挫折”转变为改革对欧洲领导方式的机遇。<sup>[5]</sup>大变局下欧美关系调整本不

---

[1] Sven Biscop,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Not Without the European Unio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2020, pp.81-94.

[2] A Wess Mitchell, “Biden Team’s Embrace of Europe Falls Short on Content,” *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biden-blinken-europe-trans-atlantic-alliance-nato-china-russia-strategy/>.

[3] Charles P. Ries, Marco Hafner, Troy D. Smith, Frances G. Burwell, Daniel Egel, Eugeniu Han, Martin Stepanek and Howard J. Shatz, “After Brexit, Alternate Forms of Brexi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K, the EU and the US,” RAND Corporation, December 2017,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200.html](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200.html).

[4] Patrick Wintour, “Henry Kissinger Says Brexit will Bring Britain Closer to the US,” *The Guardian*, June 27,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jun/27/henry-kissinger-says-brexit-will-bring-britain-closer-to-the-us>.

[5] Henry A. Kissinger, “Out of the Brexit Turmoil: Opportuni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8,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out-of-the-brexit-turmoil-opportunity-1467151419>.

可避免，英国脱欧也为这一关系的演变增添了新的变量。

#### 四、结语

英国脱欧是近年来发生在西方联盟内部的重大事件，不仅重塑了欧盟，也给欧美关系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大变局下欧美关系调整的复杂性。尽管欧美关系以安全、经贸、价值观为支撑的基本架构依然具有相当大的韧性，但其内部复杂的矛盾与博弈仍将在一定程度限制其协调力度，阻碍美国从大国竞争视角出发重新改造欧美联盟。拜登虽声称重视欧洲盟友，但执政一年来欧美关系已因美国撤军阿富汗、建立AUKUS等接连受到打击。这也再次证明，欧美均在大变局下重新定位自身利益、调整内部治理与对外战略，欧美关系将在多重变量作用下、在两者互动中重新调整。

从中国的角度看，仍需客观看待跨大西洋关系中欧美的同与异、欧美同盟的牢固性和局限性。一方面，拜登政府将加大力量拉拢欧洲支持其对华战略挤压。近年来欧洲对华疑虑也在上升，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欧洲内部也存在迎合美国的势力与声音，欧洲一定程度配合美国反华制华恐难避免。另一方面，欧美关系内部矛盾和欧美异质性也决定了欧美涉华协调的内部难度和局限。面对美方欲借助欧洲盟友增大其对华竞争中的声势和筹码，中国仍应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以实际行动做大新形势下中欧互利合作的蛋糕，不断发掘中欧合作的内生动力。

【完稿日期：2022-1-5】

【责任编辑：宁国辉】

# “价值观外交”： 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

□熊 炜 姜 昊

〔提 要〕德国新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是对默克尔政府开启的“价值观外交”的延续和继承，是作为后现代和后民族国家的德国成功转化身份的必然结果。德国国内政治生态、国际秩序变革和默克尔时期“价值观外交”实践的正向激励，都会促进德国新政府加速推进德式“价值观外交”。但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外交”，它给中德关系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未来针对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价值观外交”，中国应在坚持“红线”的基础上，注重从积极面入手，明确双方在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方面的共同点，争取相互合作以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关键词〕德国外交、价值观外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德关系

〔作者简介〕熊炜，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外交学系教授

姜昊，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心助理、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2) 1 期 0105-20

[1] 感谢《国际问题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可能的错漏由笔者负责。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缘政治风险预测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7ZDA1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外交学院重大项目“欧盟对外经贸谈判中的德国因素研究”（项目编号：3162019ZYKA04）的阶段性成果。

德国新政府的执政三党于2021年11月发布作为施政纲领的联合执政协议，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价值观在新政府外交政策中重要性的着力强调：“我们的国际政治将以价值观为基础，植根于欧洲，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协调，对国际规则破坏者持明确（反对）态度。欧盟的主权将得到加强，与民主伙伴的战略团结将得到扩大。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在内部和外部都保护其价值观和法治的欧盟。”<sup>[1]</sup>此外，德国执政三党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声称德国外交是基于价值观的外交。

尽管如此，很多分析人士仍坚持以广泛性经验来预判德国外交政策走向，认为相关政党未正式施政时对价值观在外交中核心地位的强调会很快让位于现实利益考量，在执政后会放弃其从前所坚称的“价值观外交”，因此德国本届政府迟早也将放弃或减弱“价值观外交”势头，最终会从“价值观外交”转为务实外交。然而，默克尔政府时期德国“价值观外交”形成和强化的基础决定了新政府所承诺的“价值观外交”是德国作为后现代和后民族国家身份成功转化的必然结果，而德国国内政治生态、国际秩序变革和默克尔时期“价值观外交”实践的正向激励，都会促进德国新政府加速推进德式“价值观外交”。

理解和预判德国“价值观外交”对国际秩序和中德关系的影响，关键是要关注德国的后民族国家身份和价值观体系，不能仅从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传统外交视角来理解德国外交，更不能简单地将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外交”。德国的“价值观外交”给中德关系带来的挑战并非意识形态对抗或价值观冲突，而是前者对中德政治合作划定了较为狭窄的空间范围，同时也限制了经贸合作对政治合作的外溢效应。与此同时，德国奉行“价值观外交”也是德国外交超越欧洲秩序的塑造而追求构建全球秩序的体现，对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要求我们深入理解和严肃对待德国的“价值观外交”。

---

[1] “Mehr Fortschritt wagen. Bündnis für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nd Nachhaltigkeit,” SPD, BÜNDNIS 90/DIE GRÜNEN und FDP, 24. November 2021,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74430/1990812/04221173eeef9a6720059cc353d759a2b/2021-12-10-koav2021-data.pdf?download=1>.

## 一、“价值观外交”在德国的源起与成因

“价值观外交”不是指外交政策含有价值观因素或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因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的外交均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倾向和成分，即使是实力政治时代的外交也不例外。“价值观外交”是指以价值观和规范作为外交决策出发点和外交行为准则的外交，区别于以现实的物质性国家利益为基础性驱动力的外交。在“价值观外交”中，价值观是国家利益的定义性因素，国家利益在价值观外交中被内生化，国家的价值观体系塑造国民和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外交政策偏好。

德国作为正在迈向全球性大国的地区性强国，其“价值观外交”既是对德国价值观、身份认同的对内宣示和对外彰显，也是其与国际秩序相互建构和动态塑造的结果。德国外交提出了国家权力的“价值观终极目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的首要目的是保护人的尊严和安全，不承认国家对个人尊严和安全的保护权力是排他和独占的，为了实现保护人的安全的目的，德国负有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国际义务；第二，德国愿意向欧盟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并且推动后民族国家倾向的欧洲政策；第三，德国支持现有国际法秩序和多边主义，但更加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

德国外交的这些内容深刻区别于美国（尤其是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时期）由新保守主义思潮驱动的“价值观外交”——用美国所谓的核心价值观来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美国作为霸权国的“价值观外交”常常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国之上，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被等同于“意识形态外交”，即把不认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将其定位为体系竞争对手或“异类”，实施对抗的外交方式。与美国不同，德国的“价值观外交”是以价值观外显的规范和规则为尺度，就事论事，如果违反规则，德国就对其作出反应。当然，“价值观外交”与“意识形态外交”并不能截然分开，意识形态的内核即是价值观，但“价值观外交”与“意识形态外交”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以整体对抗的方式实施。在实践中，价值观因素经常隐藏在深处，并不是在所有的外交决策中都能显示出来，但是在面临危机、

决策者不得不作出抉择的时候，价值观就将发挥重要作用。

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积极主动地推行“基于规则”的外交，开启了德式“价值观外交”的势头，集中体现为德国外交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倡导和追求。目前，德国官方外交文本中“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提法已经取代长期以来对“国际法秩序”或“国际法”的强调。德国政府虽然从未正式定义“基于规则的秩序”，也没有专门解释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德国传统上强调的“国际法秩序”有何不同。但从“基于规则的秩序”一词出现的语境来看，“规则”是“国际法”的泛化和“后民族国家化”：规则不再局限于国际法，而是将大量的“软法”包含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这些“软法”很多是由非国家行为体在跨国行为和协作中形成的、并无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承诺和规则。从“国际法秩序”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要求国家遵守这些国家并未同意的、由非国家行为体形成的规则，认为国家不仅要受到现有国际法律规则的约束、也应受跨国行为体所制定的规则的约束。<sup>[1]</sup>由此可见，德国人所说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不是仅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各国共同承诺按照现有的一套规则来开展活动，而是着眼于规则背后的规范和价值观：“基于规则的秩序”从内涵看主要包含在安全上构建多元安全共同体，在经济上促进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在政治上巩固与传播西式民主，这里的价值观指的是西方自由民主原则和规范。<sup>[2]</sup>从本质上看，它们希望打破国际秩序由国家来制定的界限，区别于以领土主权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凸显“后民族国家”的外交观念和意识。

默克尔是德国“价值观外交”的最重要倡导者和践行者，但政治家的观念和行并非仅由个人理念和偏好决定，在更大程度上是“顺势而为”。德国“价值观外交”的开启有着超越政治家个人作用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战后德国“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构建的集体学习经历和德国在欧洲扮演“价值观领袖角色”

---

[1] Stefan Talmon, “Rules-based Order v. International Law?,” German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ät Bonn, January 20, 2019, <https://gpil.jura.uni-bonn.de/2019/01/rules-based-order-v-international-law/>.

[2] David A. Lake, Lisa L. Martin and Thomas Risse, “Challenges to the Liberal Order: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2021, pp. 225–257.

是其“价值观外交”的基础。

战后联邦德国的身份属性和价值观共识经历了特殊的构建过程。联邦德国建立之初，德国政治精英选择认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这不仅是彼时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还意味着德国对其民族文化认同的“双重拒绝”——拒绝德国的过去和拒绝东方。<sup>[1]</sup>与此同时，德国全面加入西方多边主义制度，以自我束缚的承诺获得其他西方国家的信任。认同西方不仅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而且促进了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和社会交流，强化了德国的西方身份属性。德国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进程又使得欧洲认同成为德国传统民族国家认同的替代，德国不仅从战败国身份转变为“欧洲的德国”，而且德国人也开始希望成为“好的欧洲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的身份建构又发展出哈贝马斯所极力呼吁的“后民族国家”属性，即国家作为“想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并不与特定的主权国家领土空间相联系，而是建立在宪政文化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由价值观所定义的身份属性。<sup>[2]</sup>正如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导师施特恩贝格在1979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民族感受损，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德国。但是，我们生活在一部完整的宪法之下，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宪法国，它本身也是祖国的一种形式。”<sup>[3]</sup>此种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国家身份认同在德国获得巨大回响，德国主流政治精英均认同这一观念，将其看作德国接受和发展西方自由主义的巨大成就，德国也成为后民族国家自由主义的代表。

德国统一之后，虽然实现完整的国家主权，但其依然坚持后民族国家身份属性，如德国前外长菲舍尔所言：“历史的嘲讽却是，尽管我们现在终于建立了我们的民族国家，但是古典的欧洲民族国家却不再具有足够强大的力

---

[1] 熊炜：《德国“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与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期，第106-125页。

[2] 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132页。

[3] 克里斯托夫·默勒斯：《德国基本法：历史与内容》，赵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量，不再能塑造欧洲各民族的命运。如果我们期望欧洲在21世纪发挥强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和完善一体化的原则。”<sup>[1]</sup>后民族国家自由主义确信存在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奠定了全人类趋向一体化的世界社会和世界模式的现实基础，在这种价值观的关照下，德国追求所谓有“道德”的外交，德国政治精英看待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不仅仅是以传统的实力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从德国的后民族国家身份属性出发，审视德国的历史责任和外交政策目标。

政治新生代的崛起也推动了后民族国家自由主义的发展。与经历过战争或是战后出生的几代人不一样的是，德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政治精英接受大学教育的时间是在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之后，其政治意识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特定的社会环境。由于他们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经历了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高歌猛进，对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普遍高度认同，德国70后政治精英接受自由主义的路径与其前辈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有很大不同。如著名政治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扬—维尔纳·穆勒指出的那样，英法等国的传统是先从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开始，然后定格在自由民主价值上，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德国政治文化却恰恰相反，它先从全盘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原则开始，然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民族国家的宪政文化。<sup>[2]</sup>这种顺序差异导致德国政治精英的价值观认同在优先顺序上独具特点，德国精英首先将其宪法原则置于跨国开放的环境之中，重视普世价值观，主张维护价值观可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传统的基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家认同则居于次要地位。<sup>[3]</sup>

---

[1] 让·皮埃尔·舍韦内芒：《与菲舍尔的对话》，载曹卫东编：《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2] Karl Dietrich Bracher, "Politik und Zeitgeist. Tendenzen der siebziger Jahre,"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Wolfgang Jäger und Werner Link (Hrsg.), *Republik im Wandel 1969-1974. Die Ära Brandt*, Stuttgart: Wiesbaden, 1986, S.406. Jürgen Habermas, "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 Die apologetischen 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sschreibung," in Rudolf Augstein,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 Piper, 1991, S.75.

[3] Jan-Werner Müller,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Eine systematische Verteidigung," *Vorgänge*, No.3, 2010, S.111-11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面临多重危机。危机中德国领导角色的特点显示了德国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由价值观所定义，德国超强的经济实力成为其秉持“价值观外交”的物质基础，但德国又并非在危机中以推行价值观来保护和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爆发于2015年的难民危机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它堪称欧盟面临的重大危机，直接挑战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一直遵奉的欧洲价值观。正如德国政治家冯德莱恩所言，不仅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因危机受到影响，欧洲作为自由与价值观的榜样也面临着沉沦在排外心理与民族主义之中的危险。<sup>[1]</sup> 面对危机，默克尔政府在内外重重困难之下坚持开放边界迎接难民，捍卫了欧洲一贯信奉和强调的价值观，如此基于价值观的政策选择对于德国在欧盟的领导权意义重大。正如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201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所言，“两年前，德国国内有些人认为，讨论德国国际责任的增加是抽象的、想出风头的、狂妄的想法。但是最晚到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德国的国际责任上升已经是一个非常具体和直接的问题了。”<sup>[2]</sup>

与此同时，危机中的德国民意也充分体现了价值观如何影响了民众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在难民危机爆发之初，德国国内社会显现出极大的热情要求接受和帮助叙利亚难民，对人的尊严的关怀一时超越了国家边界的限制，这个时候的德国民意主要是基于价值观的呼吁和表达，而非从经济或安全利益的角度讨论是否应该接纳难民，就连德国一向媚俗的发行量最大的大众报纸《图片报》也以显著标题呼吁德国开放边界。在面对难民危机之时，德国国内社会所激发出的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共识在欧洲国家当中是极其特殊的，这是其作为后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社会生态长期发展的自然反应。因此，默克尔在2015年8月底作出开放边界的决策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而她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我们能做到”，也成为其总理生涯的“金句”(Leitsatz)。<sup>[3]</sup>

---

[1] 郑春荣主编：《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2] 同上，第3页。

[3] Edgar Wolfrum, *Der Aufsteiger. Eine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von 1990 bis heute*, Stuttgart: Klett-Cotta, 2020, S.157.

随着与难民有关的刑事犯罪事件的出现和其他负面信息的传播，德国国内在难民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但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不乏广大支持者。他们自始至终认为，欧洲如何对待难民将证明它是如何对待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虽然默克尔的决策被民粹主义者和其党内一些反对者所攻击，默克尔的民意基础依然使她能够在面对这些攻击时毫不隐讳地强调，难民危机的实质不是“危机”，它关乎“人”的尊严和价值，而不是以现实利弊的分析来赢得更多支持。<sup>[1]</sup>正是基于强大的民意基础，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政府没有在应对难民危机的过程中轻易改变立场，相反却致力于推动欧盟实施应对难民危机的整体方案，而非主权国家各自为政。<sup>[2]</sup>

而2014—2015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德国价值观外交并非囿于欧盟内部的政策或低政治领域。相反，德国将“价值观外交”一以贯之地践行于对传统地缘政治危机的处理，充分说明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体现其总体外交基调而非局部外交安排。乌克兰危机使西方和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陷入全面冲突，德国“出人意料”地领导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从传统现实主义政治角度来看，制裁俄罗斯对于德国而言是“非理性行为”“不符合德国国家利益”。众所周知，德俄之间的经济纽带极其紧密，制裁会给德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如制药业和汽车等带来巨大损失，损害德国经济利益。从德国自身安全而言，乌克兰危机也并未威胁到德国的领土边界安全。

而且，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欧盟国家对是否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还有着巨大的立场分歧，制裁措施将给一些欧盟国家的经济利益造成极大伤害，例如意大利、希腊和匈牙利等国就强烈反对。最终促使欧盟采取一致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而德国的方法正是通过诉诸欧洲共同价值观来促使欧盟成员国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在乌克兰问题上，德国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和价值观规范。一方面，欧盟国家在国际法基本原则具有高度共识，都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是不可

---

[1] “Merkel: Ein Flüchtling ist keine Krise, sondern ein Mensch,” Neues Ruhrwort, 23. Oktober 2021, <https://neuesruhrwort.de/2021/10/23/merkel-ein-fluechtling-ist-keine-krise-sondern-ein-mensch/>.

[2] 郑春荣主编：《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6）》，第6页。

接受的，同时重视尊重乌克兰的人权和公民自决权利。另一方面，德国强调欧盟对维护欧洲秩序负有特殊的责任。虽然乌克兰危机并未侵犯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边界以内的安全利益，但是出于维护人的安全的基本考虑，德国和欧盟都有道德义务实施跨越边界的保护政策。

进一步观察，德国领导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方式也体现了“价值观外交”与“意识形态外交”的重大区别。在“基于规则”的要求下，德国为取消经济制裁设定了条件，一旦俄罗斯满足欧盟的要求，欧盟就将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体现了规则针对行为而非针对某个国家。发起制裁是因为德国认为俄罗斯的行为威胁到了欧盟共同价值观，但是制裁本身并没有意识形态化，制裁的目标只在于改变俄罗斯的“非法”行为，并非要以制裁实现推广西方价值观的目的。由此可见，在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中，冲突是行为与规则之间的冲突，而非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规则是“事先判定”的标准而非事后“助攻”的武器。

从以上案例可见，德国在处理危机时并没有屈服于民族国家维度下的国家利益，而是坚持以其秉持的价值观来决定危机处理大方向，体现了这一时期德国“后民族国家”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与通常认识的另一点重大不同在于，德国在危机中对价值观的坚持在现实层面上帮助妥善处理了危机，并没有出现由价值观主导的外交在危机现实面前苍白无力的局面，反而体现了德国“价值观外交”的力量，对价值观的成功维护极大地加强了德国在欧盟的领导权威，默克尔甚至被西方媒体认为是“欧洲最后一位还站着的领导人”“默克尔有责任代表过去70年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西方发言”。<sup>[1]</sup> 这一系列正向激励为德国“价值观外交”的延续和发展储备了动力。

## 二、德国新政府：延续和加速“价值观外交”

从默克尔政府时期的“价值观外交”成因分析可见，德国的“价值观外交”

---

[1] 菲利普·斯蒂芬斯：《默克尔是西方衣钵的继承人》，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年11月22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43?archive>。

并非系于默克尔一身的政治任务，而是基于历史、国内政治结构、德国的国际角色期待、外交实践正向激励等更为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会因为默克尔的卸任而消失。相反，新政府的构成本身即是这些因素的体现，因此可以预见“价值观外交”将会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 （一）新政府“价值观外交”的民意基础

2021年德国大选显示出德国选民的代际变迁与价值观变化。在大选中，德国传统大党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失去选民最多的两个政党。绿党在大选期间曾一度以高达29%的支持率超过传统大党，而此后稳定在22%左右，虽然最后在大选中受政治家形象拖累等原因只获得14.8%得票率，但绿党仍以第二大力量参与组阁。绿党是公认的最为强调价值观的德国政党，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德国新社会运动，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从最初主张世界主义、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发展到关注女权和草根民主、多元文化主义等主题，覆盖的目标人群也更加多元化，绿党的选民是德国后民族国家自由主义最为坚定的支持者。

绿党的政治主张尤其受到德国年轻人的推崇。2021年大选期间，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选民当中，绿党的得票率领先于其他所有党派。绿党所关注的政治议题也已经成为德国政治辩论的核心议题，各个党派的竞选纲领中都出现了气候生态、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而且表述更加细化。在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绿党提出的“经济的生态现代化”被全盘接受。新政府还表示，要以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为目标改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大党持续衰落和绿党强势崛起反映出德国国内社会民意变化以及政治生态进一步年轻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大党基于宗教信仰、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的选民定位让位于更加“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倾向，德国人越来越注重个人自由与价值实现，关注气候变化、数字转型等新兴议题对民主价值观和人的安全所带来的影响。在科尔博基金会联合皮尤公司开展的2021年民意调查显示，年龄18岁至34岁的受访者中，65%认为德国应该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气候变化是目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71%认为数字转型是民主

发展的机遇。<sup>[1]</sup>总的来看，年轻一代选民没有像其前辈那样背负过多历史包袱，他们从不觉得德国在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上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先天劣势，反而觉得德国作为“后民族国家”观念的先行者，更具有世界公民意识，因而以捍卫自由主义价值观原则和国际秩序为己任。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必将体现和反映年轻人的诉求。

## （二）代表德国政治新生代的新政府

代际更迭是德国价值观外交民意基础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新生代的“后民族国家”认同增强，更为强调国家作为价值观载体的存在和价值观实现的功能。2021年的大选结果突出显示出，德国政治新生代已经迅速崛起。本届德国联邦议员的平均年龄为47.3岁，是德国统一以后平均年龄最小的一届议会，<sup>[2]</sup>其中45岁以下的议员占比为38.74%。<sup>[3]</sup>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执政三党已经将未来德国议会选举的年龄要求降低至16岁，这无疑会继续加快德国政治生态年轻化趋势。<sup>[4]</sup>执政三党的四位新党魁中有两位70后和一位90后。新政府17位内阁成员中，有九位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政治家，占到内阁成员的半数以上。绿党政治家贝尔伯克41岁就任外交部长，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外交部长。另外，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更是任命多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国务秘书（副部长）。总体而言，德国新内阁以70后和80后为主力，这些政治新生代不仅体现了德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更反映了德国主流观念的变化。

贝尔伯克在候任外交部长时就明确表明自己对领导德国外交的态度，声

---

[1] Körber-Stiftung, “The Berlin Pulse Survey 2021/22,” [https://www.koerber-stiftung.de/fileadmin/user\\_upload/koerber-stiftung/redaktion/the-berlin-pulse/pdf/2021/TheBerlinPulse\\_2021\\_komplett.pdf](https://www.koerber-stiftung.de/fileadmin/user_upload/koerber-stiftung/redaktion/the-berlin-pulse/pdf/2021/TheBerlinPulse_2021_komplett.pdf).

[2] “Das Durchschnittsalter der Abgeordneten jeweils zu Beginn der Wahlperioden,” Deutscher Bundestag,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272474/c450bf40c5fe1e8c70756ee37e57663f/Kapitel\\_03\\_02\\_Durchschnittsalter-pdf-data.pdf](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272474/c450bf40c5fe1e8c70756ee37e57663f/Kapitel_03_02_Durchschnittsalter-pdf-data.pdf).

[3] “Sitzverteilung des 20. Deutschen Bundestages,” Deutscher Bundestag, [https://www.bundestag.de/parlament/plenum/sitzverteilung\\_20wp](https://www.bundestag.de/parlament/plenum/sitzverteilung_20wp).

[4] “Mehr Fortschritt wagen. Bündnis für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nd Nachhaltigkeit,” SPD, BÜNDNIS 90/DIE GRÜNEN und FDP.

称要在国际上更加坦率直白地强调价值观。她称，“对话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掩饰或保持沉默”；“对我来说，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对话与强硬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远来看，雄辩的沉默不是一种外交形式，即使近年来有些人是这样看待的”。<sup>[1]</sup> 更有趣的是，新任财政部长、42岁的自民党政治家林德纳认为，德国不应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价值观，并且明确表示：“德国制造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质量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出于其他（政治和价值观）因素而导致德国汽车公司销量或市场份额受到影响，我们将不得不接受。”<sup>[2]</sup> 这些70后和80后内阁成员赞赏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乌克兰危机时期所推动的“价值观外交”，但与此同时却认为默克尔仍不够公开坚持价值观、过于沉默和含蓄，他们承诺将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德国“价值观外交”。

### （三）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新政府外交

与代际转变伴生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进一步影响政治并成为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无疑会进一步推动新政府采取和实施“价值观外交”。新一届德国政府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特点是，除总理朔尔茨之外，十六个内阁部长分别由八位女性和八位男性担任，女性比例前所未有，这不仅是数量上的改变，还带来了质量上的差异。本届政府集中体现了女性主义特质，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这三个主管外交安全政策的职位均由女性担任，其中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的职位还是首次由女性担任。这种性别比例的新平衡体现出女性主义在德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前总理默克尔在任时虽然不刻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但卸任之后也高调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sup>[3]</sup> 新政府总理

---

[1] Felix lee, Jasmin Kalarickal und Tobias Schulze, “Annalena Baerbock über Außenpolitik ‘Schweigen ist keine Diplomatie’,” taz, 1. Dezember 2021, <https://taz.de/Annalena-Baerbock-ueber-Aussenpolitik/!5819421/>.

[2] Mark Hallam, “Exclusive: Afghan refugees should not take ‘dangerous’ road to Europe, FDP top candidate Christian Lindner says,” DW News, September 2, 2021, <https://www.dw.com/en/exclusive-afghan-refugees-should-not-take-dangerous-road-to-europe-fdp-top-candidate-christian-lindner-says/a-59059387>.

[3] “Germany’s Angela Merkel declares ‘yes, I am a feminist’,” DW News, September 8, 2021, <https://www.dw.com/en/germanys-angela-merkel-declares-yes-i-am-a-feminist/a-59127993>.

朔尔茨也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sup>[1]</sup>

事实上，女性主义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已经成为德国外交的一个流行词，执政联盟甚至将女性主义外交政策首次写入联合执政协议之中，决心要“加强全球范围内妇女/女童的权利、资源和代表性，促进社会多样性，希望派遣更多女性担任国际管理职位，雄心勃勃地落实执行联合国第1325号决议的国家行动和发展计划”。<sup>[2]</sup>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核心意味着价值观和规范承诺，<sup>[3]</sup>强调“个人的即政治的”，外交需要关注人的安全、自由、监控、国家边界管控、公民身份、移民等问题。女性主义外交政策还将外交议题置于公共讨论的空间中，在论辩中达成社会共识。而在所有关于外交议题的论辩中，关于价值观的论辩是核心内容，涉及人权与主权、欧洲一体化与公民身份、价值观与利益等富有争议的议题。同时，更加多元的行为主体将参与到外交政策的公共讨论中来，这也必将增强德国国内政治议题国际化的趋势。随着女性主义者对德国外交和安全战略文化的重塑，价值观势必会对德国外交决策与实践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四）欧洲和美国对德国的价值观角色期待

欧洲和美国都对德国新政府寄予厚望，期待德国在国际上承担更多领导责任，继续发挥其价值观捍卫者和榜样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德国曾利用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推动欧盟出台复苏计划，领导欧盟应对疫情、气候变化和数字化转型等重大议题，德国在欧盟内部谈判中也作出重要财政贡献，德国的行动受到欧盟国家的好评，但与此同时，欧盟对德国的领导作用还有更多的期待。

目前欧盟面临的挑战不仅存在于经济和安全方面，更重要的是与基本价值观与规则相关。在欧盟内部，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波兰和匈牙利两国与欧盟

---

[1] “20 Fragen an: Olaf Scholz,” EMMA, 27. September 2021, <https://www.emma.de/artikel/kanzlerkandidatolaf-scholz-338945>.

[2] “Mehr Fortschritt wagen. Bündnis für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nd Nachhaltigkeit,” SPD, BÜNDNIS 90/DIE GRÜNEN und FDP.

[3] 雅基·特鲁：《女性主义的伦理观》，载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邓肯·斯尼达尔编：《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方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43-457页。

的法律争端也对欧盟的法律规则和基本价值观提出了挑战。<sup>[1]</sup> 在外部边界，欧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从整体来看，“欧盟面临着更具敌意的安全环境，这在近几年全球博弈加剧后显得尤为突出。像软实力等因素都成为了武器化的政治竞争工具。混合威胁和新兴威胁越来越多，战争与和平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欧盟因经济、战略、政治和价值观受到的挑战存在‘战略收缩’的风险”。<sup>[2]</sup> 在此背景下，德国的领导力意味着德国需要以更明确的实际行动来加强“一个能保护其公民、维护其价值观和利益，对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的欧洲”。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拜登对德国的领导角色同样怀有很高的期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高调宣称，“美国在世界上没有比德国更好的朋友。”<sup>[3]</sup> 美国期待德国领导欧盟配合其全球战略实施，如美国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颁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所规划的，“重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携手推进其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建立所谓民主联盟，形成共同战线，集中力量推动高标准，建立有效的国际规则，并让中国等国家承担责任。”<sup>[4]</sup> 美国仍然在修复特朗普政府破坏国际规则所带来的现实和道义的后果，而经受住严峻考验的德国在维护和建立国际规则方面成为拜登政府不得不依赖的伙伴。

对于欧洲和美国的期待，德国新政府给予积极的回应。联合执政协议明确宣称：将在欧洲框架内制定共同战略，保护在欧洲的自由生活方式以及对和平与人权的保护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希望欧盟基于《欧洲联盟条约》第2条的规则实施有效的保护，呼吁欧盟委员会更一致、更迅速地使用现有的法律手段；致力于在欧洲的基础上塑造跨大西洋关系，通过以规则为基础的

---

[1] Judy Dempsey, “Poland Tests the EU’s Future,” Carnegie Europe, October 14, 2021,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1/10/14/poland-tests-eu-s-future-pub-85565>.

[2] 杨海峰：《欧盟‘战略指南针’草案出台，真能‘指南’吗？》，澎湃新闻，2021年12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2412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24129)。

[3] Laurenz Gehrke, “Blinken: US has ‘no better friend in the world than Germany’,” Politico, June 23,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nited-states-no-better-friend-than-germany-us-ally/>.

[4]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国际秩序对抗威权主义的发展；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建立气候和能源伙伴关系，并在人权、卫生政策、贸易、交通、国际标准、裁军、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开展密切合作，在数据主权、网络自由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跨大西洋对话。<sup>[1]</sup>

面对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失势”，欧美加强团结以增强西方力量已是跨大西洋两岸的共识，在欧洲也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德国及其盟友将在2022年推出包括欧盟“战略指南针”计划和北约战略新概念等重要战略文件，具体规划欧美同盟如何定义利益、整合资源和手段以及解决分歧的路径等问题。正如德国对外关系协会主任阿什布鲁克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些文件都不能为解决长期问题提出方案，但是它们都必须回答“我们代表什么？我们是谁？”的问题。<sup>[2]</sup>换言之，在西方面临的共同挑战更加明确、更加意识到西方制度体系的脆弱性之时，德国及其盟国有必要坚决宣示其共同价值观和身份认同。

### （五）新政府的“价值观多边主义”

默克尔时期的德国“价值观外交”是危机应对型的，更多是在危机情况下基于价值观的一种应激反应，实施的重点地区是在欧洲及其邻近地区，议题主要体现在安全领域，未来德国新政府将以整体的多边主义战略更加积极地推进德式“价值观外交”。

在德国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多边主义居于德国外交的核心地位，是联结德国外交各个领域和方向的一条主线。2021年5月德国政府颁布的《多边主义白皮书》称：德国的多边主义是基于价值观的多边主义。<sup>[3]</sup>德国新政府实施“价值观外交”的整体目标是：推进基于价值观的多边主义和抵制所谓基于威权主义的多边主义。德国认为两种多边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多边主义认同为规范和原则，而后者仅仅将多边主义看作实现民族国家目标和利

---

[1] “Mehr Fortschritt wagen. Bündnis für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nd Nachhaltigkeit,” SPD, BÜNDNIS 90/DIE GRÜNEN und FDP.

[2] Cathryn Clüver Ashbrook, “Vom Ende des Reagierens: Deutschland in einer gefährlichen Welt,”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anuar/Februar, 2022, S.58-63.

[3] “Gemeinsam für die Menschen. Weißbuch Multilateralismus der Bundesregierung,” das Auswärtiges Amt von Deutschland, Mai 2021,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460050/c43d710424e1f0c2d16e86a70f35ad02/weissbuch-multilateralismus-data.pdf>.

益的工具。<sup>[1]</sup>

以基于价值观的多边主义为衡量标尺，德国区分其外交伙伴并定义利益。多边主义的原则要求参与多边主义的国家有意愿将其资源用于多边主义的共同目标，能够为达成合作而调整或改变自己。德国期待外交伙伴具备这种意愿，而德国基于其后民族国家认同，更是愿意为实现多边主义目标而满足其外交伙伴的期待。按照这种标准，德国目前最重要的外交伙伴是法国和美国以及相应的多边主义机制——欧盟和北约。<sup>[2]</sup>

在全球层面，德国政府声称将寻求与其民主伙伴密切合作，深化在外交、安全和发展政策方面的伙伴关系，捍卫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德国首先重视的多边主义机制是联合国，此外还宣称要支持民主联盟、多边主义者联盟、七国集团（G7）、经合组织这些与德国的价值观基础相一致的多边主义机制，希望与其他西方国家密切联系并分享价值观，认为这关乎到与威权国家的体制性竞争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sup>[3]</sup>2022年1月1日，德国正式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德国外交部发布新闻稿称，德国在担任主席国期间将设置气候保护、多边主义和增强民主韧性三项重点议程，宣布除6月底峰会外，还将于5月底和秋季举行两次外长会，并邀请非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伙伴作为特邀国家出席。在联合国的一些关系到自由主义原则和规范的核心领域，德国也将极力推动其目标的实现。为应对气候变化、疫情等全球性问题，德国承诺将全力推进相应的多边机制发展。此外，德国新政府还将致力于协调全球范围内不同形式的多边贸易体系。在裁军和军控领域，德国将加强“裁军政策攻势”，以助力世界无核化为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致力于推进美俄双方裁军谈判，并在未来加强推动中国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与

---

[1] Hanns W. Maull, “Multilateralismus und Partnerschaft in der deutschen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in SWP-Stu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im Wandel*, 30. September 2021,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studien/2021S15\\_Deutsche\\_Aussenpolitik.pdf](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studien/2021S15_Deutsche_Aussenpolitik.pdf).

[2] Hanns W. Maull, “Multilateralismus und Partnerschaft in der deutschen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3] “Mehr Fortschritt wagen. Bündnis für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nd Nachhaltigkeit,” SPD, BÜNDNIS 90/DIE GRÜNEN und FDP. Hanns W. Maull, “Multilateralismus und Partnerschaft in der deutschen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in SWP-Stu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im Wandel*.

核裁军与军控进程。

### 三、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德关系

德国的“价值观外交”是德国在国际政治中能够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德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中推行更“务实”对华政策的国家。在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大国竞争中的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等不稳定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时，中德关系能够保持冷静务实的发展趋势更为难能可贵，因此德国新政府的“价值观外交”无疑会带来人们对未来中德关系发展的担忧。但德国的“价值观外交”毕竟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有所区别，而且德国基于价值观的多边主义在很多方面或许还与中国外交具有一些相互兼容和助力的潜力，因而德国新政府实行“价值观外交”可能也会给中国外交和中德关系带来机遇。同时也不能否认，德国外交所基于的价值观和倡导的规则与中国外交的价值观体系和理念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甚至冲突，这也意味着中德关系发展必定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and 困难。

#### （一）中德关系发展的机遇

第一，德国以“价值观外交”作为外交整体框架和根基意味着，德国外交并不刻意区分传统意义上的高政治和低政治，相反其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民族国家身份决定了德国外交更注重全球治理中的重大议题，德国也不仅仅以传统的国际权力分布和消长来定位风险和挑战。在传统外交观念中，权力竞争的阴影实际上限制和阻碍着国际关系中的合作，而德国的“价值观外交”摒弃了从实力政治来看待国际关系，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发挥国际影响力并不像美国那样心存忌惮。虽然德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也具有塑造国际秩序的雄心，但作为后民族国家的德国并不以权力竞争的方式和视角来看待大国崛起，因而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不会特意针对中国的发展。而中国致力于通过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塑造国际秩序与德国外交的目标颇有相合之处。因此，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减少了中德之间在高政治领域的竞争意识

和竞争关系，这对于中德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关系无疑具有正面意义。

第二，德国“价值观外交”的核心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反映出德国的国际秩序观带有法治、稳定、审慎等强烈的德国特色。在美国外交由于其国内思潮和政治极化带来不稳定的时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要求德国发挥防止美国进一步破坏国际秩序的作用。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中基本而重要的规则、尤其是防止美国的破坏作用方面，中德拥有共同的意愿和较好合作空间，而且中德两国均追求国际关系中的“法治”，都是国际法的维护者。

第三，德国“价值观外交”的实质决定了该国政府不会也不能在国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划线，而会基于具体的规则来行事，至少会尽力追求“对事不对国”的外交效果。因此中德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差异并不会导致德国对中德关系的全盘否定，也决定了德国在外交中不会参与到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而进行与中国“脱钩”的行动中。相反，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需要中国的支持，德国仍然会对中国认同这些规则寄予厚望。因此，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会对美国的“脱钩”企图产生抵制作用。

## （二）中德关系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德国对华政策是所谓“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战略，但自2019年以来，德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框架已经转变为“现实性接触”（realist engagement）战略。“建设性接触”政策的核心是“以商促变”，而“现实性接触”政策则承认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的分歧与差异，不寻求改变对方，两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竞争的，但需要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对话和合作。<sup>[1]</sup>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德国新政府加速推进“价值观外交”，德国对华“现实性接触”政策的内容将更加具体，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德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第一，德国新政府将在对华政策中更加强调人权和价值观议题。德国外

---

[1] 熊炜：《德国对华政策转变与默克尔的外交遗产》，《欧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1页。

长贝尔伯克自称将“为价值观而宣传”（Für Werte werben）。<sup>[1]</sup> 在德国政客的挑动下，涉疆、涉港等问题可能会严重阻碍双边关系发展，德国执政三党都已明确表明其立场，绿党和自民党甚至还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越线，为未来中德关系预埋风险的种子。

第二，德国新政府将在信息技术合作、公平贸易、中欧投资协定等中德经贸合作议题中注入更多价值观因素，以强调规范、原则为基本立场，更加强硬地维护德国所认定的自身利益。德国希望明确在实际合作领域中的共同利益和其利益交汇点的界限，不盲目扩大中德经贸合作的领域和范围。2021年12月，德国外长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德国新政府将与中国就共同价值观和标准加强沟通理解，价值观和利益并不对立，但是为了避免德国经济处于严重竞争劣势，德国不允许中国不遵守规则和标准。<sup>[2]</sup>

第三，德国将推动美国与欧洲合作以鼓励发展更强监管标准的服务贸易，重视七国集团、经合组织这些所谓“志同道合”的多边主义机制，主导未来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在经贸合作中注入价值观因素，以多边规则制约中国的发展。

但即便如此，德国对华“价值观外交”中的“现实性”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虽然德国政治家和官方文件前所未有地宣称对华政策中的价值观因素，但是德国领导人在强调意识形态竞争的同时，重点突出的是中德关系中的竞争规则。例如，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021年12月发表的首份政府声明中指出，德国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德国“不能对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视而不见”“违反普世标准时应直言不讳”，但朔尔茨却一直避免对中国使用“制度性竞争”的概念，体现出其避免“价值观外交”意识形态化的考虑。另一方面，“现实性”也意味着德国对中国的现实具有理性认知，朔尔茨强调由于中国变得更加自信和强大，德国基于此种现实也应作出反应，

---

[1] Felix lee, Jasmin Kalarickal und Tobias Schulze, “Annalena Baerbock über Außenpolitik ‘Schweigen ist keine Diplomatie’”.

[2] Jörg Lau und Samiha Shafy, “Annalena Baerbock ‘Werte und Interessen sind kein Gegensatz’,” Zeit Online, 22. Dezember 2021, [https://www.zeit.de/2021/53/annalena-baerbock-aussenpolitik-russland-china?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m.hk%2F](https://www.zeit.de/2021/53/annalena-baerbock-aussenpolitik-russland-china?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m.hk%2F).

同时人权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是一个拥有辽阔国土和悠久历史的国家并在当今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的现实，所以德国需要与中国在人权、气候、疫情和军控等领域开展合作，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下进行公平、互惠互利的经济竞争。<sup>[1]</sup>

#### 四、结语

德国新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是对默克尔政府时期开启的“价值观外交”的延续和继承，历史记忆、国内政治生态变迁、国际期待和外交实践的正向激励等因素都将推进德国“价值观外交”的发展势头。对利益和价值观的讨论一直是外交政策分析的核心问题，强调德国外交的价值观基础并非认为德国外交忽视物质性的国家利益，而是要以超越利益和价值观两分法的传统研究路径，探讨德国如何因其独特的“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而定义其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利益。

虽然德国新政府具有推进“价值观外交”的强烈意愿，但在实践中，德国实施“价值观外交”仍面临国家实力不足和国际环境限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拥有发挥领导力的超强经济实力，而且德国保持和强调其“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还满足了欧洲国家对德国的期待，欧盟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后民族国家”观念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因而德国能够在欧洲顺利推行其“价值观外交”。但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多样性的价值观体系，德国在面对与更强实力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时，其“价值观外交”实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重重困难，而不得不进行现实妥协。

【完稿日期：2022-1-10】

【责任编辑：肖莹莹】

---

[1] Olaf Scholz, “Wir werden neue Wege einschlagen,” die Bundesregierung, 15. Dezember 2021,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uche/regierungserklaerung-1991504>.

# Abstracts

## **China's Diplomacy in 2021: Embracing a Global Vision and Serving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WANG Yi

For China's diplomacy, the past year has seen us acting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As a result, we have conducted effective anti-COVID diplomacy, fulfill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injected new impetus into economic recovery, and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mmon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we have held high the torch of true multilateralism, and firmly upheld the authority of the UN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Moreover, we have promoted the overall steady growth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other major countries, endeavored to buil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ined force with our neighbors to build a beautiful homeland, and upheld regional peace and tranquility. We have worked vigorously to develop the potential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rther, held high the banner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ctively promoted reforms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esolutely defended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ignity. And we have worked all-out to serve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are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people through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foreign service members will rally even more closely arou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We will make utmost efforts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stay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steady growth of China-US relations. Furthermore, we will take proactive steps to tackle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ost-COVID era, push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expand and deepen global partnerships, firmly safeguard China's core interests, an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make mor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 **China's Foreign Ai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LUO Zhaohui

Foreign aid is the best platform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embracing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70 years, China’s foreign aid work has been guided by Marxist internationalist theory, adhering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ttribut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s a result, we have been actively cooperating with the West while upholding the spirit of struggle, making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ing valuable experie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unstoppable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of rising in the east and falling in the West, China will take on mor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shoulder higher expectati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face mor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rom the West. And foreign aid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grip to promot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2022, China’s foreign aid will continue to lead the international anti-pandemic cooperation with head-of-state diplomacy as the top priority, focus on people’s livelihoods to 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after the pandemic, help to build the Green Silk Road,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a multilateral platform.

##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Assist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ANG Chao

China’s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which has shown it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in practice, i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official diplomacy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and strategic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 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People’s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CPIFA) has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making friends for the countr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 the CPIFA

summarized in depth the theory of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actively carried out new practices of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As a result, the CPIFA has helped increas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enhanced mutu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nd truly brought peoples' hearts and minds together. Thus, the CPIFA plays a unique role in supporting overall diplomacy and promot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Standing at the new starting point of achieving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CPIFA will firmly concentrate on the central tasks of the CPC and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constantly push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and strive to make new progress in the new era in the aspects of better telling the stories of China,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friendship among peopl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hina's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will surely sparkle with new vitality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ra.

## **Actively Breaking New Ground i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LIN Songtia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s the fundamental work to enhance peoples' friendship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a country's overall diplomac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PAFFC),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established a platform to connect five continents and interact at home and abroad. These rich resource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we have adhered to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inking as our guide, actively promoted the Association's transformation from a "doer" to a "planner" and a "momentum builder", and completed the overall framework design of new orientation, new ideas, new layout,

new pattern and new measures. Moreover, the CPAFFC strived to solve the “four problems” of having a place to talk, someone to talk, someone to listen and someone to believe, promoted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ities in the new era with high quality and created a series of brand activities and demonstration sites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play the “three major roles” of the Association in leading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serving as the mainstay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bridge to city diplomacy, to buil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enhance people-to-people and heart-to-heart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to advance the themes of the times featuring peace,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to better tell the stories of China,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cohesiveness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 **A Few Thoughts on China-US Relations**

CUI Tiankai

The changes in China-US relations are a pivotal part of the world’s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past century. As for the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first “establish correct views of history,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players” and see which side of history is correct and in which direction human progress is heading.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look far ahead, start early, get well prepared, and actively grasp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We should also understand and plan China-US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overall strategic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eanwhile, We sh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the principle of “upholding the people’s supremacy”. We should be sober minded and fully prepared, resolutely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safeguard the overall strategic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urthermore, in our external work, we should also give better and more effective play to the rol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show its unique charm, and achieve the effect of moistening things silently.

---

## **The “Two Establishments” are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Further Achievements of China’s Diplomacy**

RUAN Zongze

The “Two Establishments” are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uniting and leadi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to march forward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re of decisive significance to advanc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far a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cerned, the “Two Establishments” ar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hina’s diplomacy to keep upright and innovative, to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world pattern, and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s of the times. They are also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China’s diplomacy to carry forward the past and forge ahead into the future on the new journey, to create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o maintain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the chaotic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o lead global change and to make further achievements.

##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s of Promotion**

XING Liju & YAN Chuanruolan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re universal values proposed by Xi Jinping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theory, focusing o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mankind. They are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realit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y also surpass western “universal value” by featuring with successive, innovative, inclusive, up-to-date, and advanced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China should strive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mote the reforms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facilitate mutual exchange among civilizations.

## **The EU-US Policy Coordination toward China: New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YAN Shaohua

With the continued rise of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olicies of the US and the EU, China has topped the agenda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To address the rise of China and renew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the EU and the US have enhanced their consultations on China, seeking to build broader consensus and pursue a more coordinated approach towards China in crucial areas of ideology, trade, technology and global governance. Compared with the earlier stage, the current EU-US coordination on China is more institutionalized and more comprehensive, with the US no longer 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ordination, there has been certain consensu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s China, but divergences have also been reveal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cognition and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 EU’s tendency of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rumpism” legacy will restrict the depth and effect of EU-US coordination.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path have determined that the US and the EU will not succeed in a Cold War-style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China. “Peaceful co-existence” should be a basic principle for EU-US coordination and China-US-EU trilateral relations.

## **The Impacts of Brexit on EU-US Relationship**

ZHANG Bei

Brexit is not only a major political event in Britain and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Before Brexit, the UK occupied a unique position in EU-US relations, serving as a necessary bridge between the two and shaping the EU in a way that suited the US interests. However, Brexit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EU, driving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shifts and policy adjustments. It will also change how EU and the U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evolving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n the unfolding of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djustments, and Brexit has become a critical internal variable in this process.

## **Value-based Diplomacy: The Diplomatic Axis of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

XIONG Wei & JIANG Hao

The value-based diplomacy proposed by Germany’s new government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same policy initiated by the Merkel government. I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Germany’s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 as a postmodern and post-nation state. Germany’s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ositive incentives of Merkel’s practice of value-based diplomacy will promote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value-based diplomacy with Germa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Germany’s value-based diplomacy, which bring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developing China-German relations, is not entirely equivalent to “ideology-based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in view of the value-based diplomacy in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China should,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red line”, focus on the positive side, clarify the common ground of the two sides in the rules and systems of multilateralism, and strive for mutual cooperation to shape a more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der.

# 投稿注意事项

《国际问题研究》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刊物之一。本刊以服务中国外交为宗旨，坚持战略性、前瞻性与政策性相结合，提倡从国际战略的高度来研究国际问题，在学术分析中体现中国外交战略思维，为外交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主要栏目有中国外交、地区与国别问题、经济与外交、全球治理等。欢迎有志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向本刊投稿。

投稿者务请注意以下事项：

一、来稿请提供电子版。严格遵守学术规范，须有中英文内容摘要及关键词、完稿日期、作者简介。摘要应概括地反映文章的主要内容，不要与引言相混淆，字数在 300 ~ 500 字；关键词 3 ~ 5 个。来稿字数以 10000 字左右为宜，不得低于 8000 字。

二、引用的文献、观点和重要事实要注明来源，电子文献的引用应源自官方或权威网站，并提供有效访问路径。本刊的引文注释规范可在以下网址查询：<https://www.ciiis.org.cn/gjwtyj/>。

三、文中首次涉及的外国人名、地名、重要职务和职称、机构名称及其他专用名称（常见和约定俗成的除外），请在中文译名后括号标注原文。

四、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称、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子信箱，以便联系。

五、本刊对来稿有权删改。如不同意，务请在来稿中注明。

六、请勿一稿多投，一旦发现，本刊将予以追究。稿件发出一个月后未被采用或未接确认采用通知的，可自行处理。

七、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电子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该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相关稿酬不再另行支付）。

八、本刊版权所有，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头条 3 号，《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05

联系电话：010-85119558/85119092

电子信箱：[gyzz@ciis.org.cn](mailto:gyzz@ciis.org.cn)

# 《国际问题研究》引文注释规定 (试行)

为便于学术交流和加强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引文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本刊制定了如下规范,希望投稿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并提出宝贵意见。

## 一、体例及标注位置

《国际问题研究》的引文出处均应采用页下注(脚注),每页重新编号,注释序号样式不作特殊要求。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之后。

- 示例:

2021年3月,中国政府开启“春苗计划”,<sup>[1]</sup>目前已经帮助20多万海外同胞在当地接种新冠肺炎疫苗。<sup>[2]</sup>

## 二、标注格式

### (一) 非连续出版物

#### 1. 著作

-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

- 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引用翻译著作时,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作者为两人时均作标注,中间用顿号隔开,作者为三人以上的,可只标注第一作者,并在其名字后加“等”。

- 示例:

解力夫:《中东战争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郑瑞祥主编:《印度的崛起与中印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 2. 析出文献

- 标注顺序:析出文献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

任方式、文集题名、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 示例：

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266页。

## （二）连续出版物

### 1. 期刊

-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页码。

- 示例：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9-13页。

### 2. 报纸

- 标注顺序：责任者（如有）、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

- 示例：

徐步：《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发展之路》，《人民日报》2021年6月7日，第13版。

## （三）未刊文献（学位论文等）

-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标题、论文性质、学校、文献形成时间。

- 示例：

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67页。

## （四）电子文献

- 标注顺序：责任者（如有）、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来源、发布或更新日期、访问路径。

- 示例：

《习近平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新华网，2021年10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10/17/c\\_112796630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10/17/c_1127966309.htm)。

## （五）外文文献

引证外文文献，原则上使用该语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本规范仅列举英文文献（字体采用Times New Roman，标点符号皆为半角格式）的标注方式如下：

### 1. 专著

-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 文献题名用斜体（首字母大写），出版地点后用半角冒号，其余各项用半角逗号隔开。

- 示例：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997, p.33.

2. 译著

-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译者、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 文献题名用斜体（首字母大写），出版地点后用半角冒号，其余各项用半角逗号隔开。

- 示例：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William Marsden, trans., Hertfordshire: Cumberland House, 1997, p.55.

3. 期刊和报纸

- 标注顺序：责任者（如有）、文献题名、期刊 / 报纸名、卷册及出版时间、页码。

- 文献题名用半角引号标识（首字母大写），期刊 / 报纸名用斜体，其余各项用半角逗号隔开，卷、期、页码等缩写后无空格，月份（如有）用全称。

- 示例：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391-425.

Daniel Mendelsohn, “But Enough about Me,” *New Yorker*, January 25, 2010, p.68.

Zhao Jianglin, “Asian Economies Better off without Interference,” *Global Times*, June 1, 2021, p.11.

4. 文集析出文献

-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编者、文集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 示例 1：Fen Osler Hampson, “Human Security,” in Paul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280-285.

– 示例 2: Barry Buzan, “Security, the State,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Beyond,”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1.

### 5. 档案文献

– 示例 1: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RES/2597(2021),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eptember 17, 2021.

– 示例 2: “Memorandum of Eisenhower-Churchill-Bidault Meeting,”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ume V*, December 7, 1953, pp.1808-1818.

### 6. 电子文献

– 示例 1: “China, U.S. Issue Joint Declaration on Enhancing Climate Action,” Xinhuanet, November 11, 2021, [http://www.news.cn/english/2021-11/11/c\\_1310303431.htm](http://www.news.cn/english/2021-11/11/c_1310303431.htm).

– 示例 2: Martin Jacques, “G7 No Longer Able to Order World Around,” *Global Times*, June 8, 2021,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6/1225664.shtml>.

– 示例 3: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Fight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fighting-the-covid-19-pandemic-3>.

– 示例 4: James G. McGann,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anuary 28, 2021, <https://www.gotothinktank.com/global-goto-think-tank-index>.

## 三、其他注意事项

### (一) 再次引用

– 再次引用同一资料来源时，只需标注责任者、题名、页码。

– 示例：

解力夫：《中东战争实录》，第 43 页。

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81.

– 如在同一页且紧接同一资料来源的上一注释，中文可以用“同上”代替，英文则可用 *Ibid.*（斜体）代替。

- 示例：

（中文）同上，第 45 页。

（英文）*Ibid.*, p.87.

（二）关于译名和简称

- 外国人名、地名采用新华社标准译法，不采用港台译法，不使用俗称或昵称，不用单个汉字或某氏指称某人。

- 国名单独提及时，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再次出现可用通用简称，不得采用一个字表示。

- 官名采用规范简称或通用简称。如“外交部长”可简称为“外长”。

（三）转引文献

- 示例：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8-89 页。  
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3 页。

F. G. Bailey ed., *Gifts and Poisons: The Politics of Reput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1, p.4, quote from Paul Ian Midford, “Making the Best of a Bad Reputation: Japanese and Russian Grand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Dissertation, UMI, No.9998195, 2001, p.14.

## 欢迎订阅

《国际问题研究》是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综合性学术期刊。刊物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长期被列入中文核心期刊（国际政治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全文收录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亦以本刊文章作为重要参考来源。本刊以服务中国外交为宗旨，坚持战略性、前瞻性与政策性相结合，旨在为外交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主要栏目有：中国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地区与国别问题、经济与外交等。

本刊英文版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面向国内外读者，在外国驻华机构及国外智库媒体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 《国际问题研究》及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可在全国邮局订阅：
- 《国际问题研究》 国内代号：82-1； 国外代号：Q523
  -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内代号：80-477； 国外代号：BM4946

《国际问题研究》每期定价 15 元，*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每期定价 30 元，本刊编辑部常年办理零售、订阅服务，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头条 3 号，《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05  
联系电话：010-85119092；85119638  
电子信箱：[gyzz@ciis.org.cn](mailto:gyzz@ciis.org.cn)